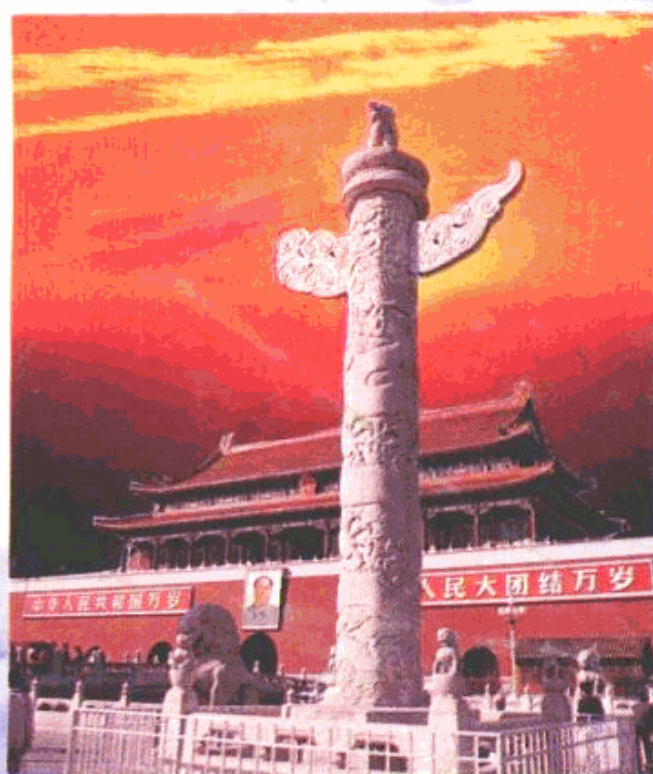


“中华魂”华夏名人传记系列

施国 海童 总主编

科学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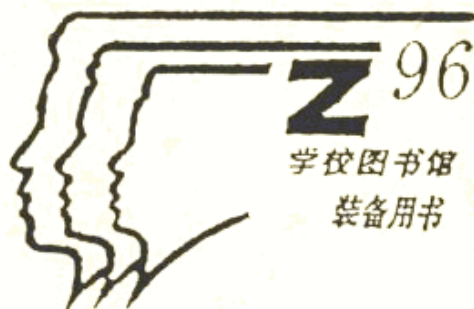
# 葛洪



中国华侨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祖民

封面设计：程全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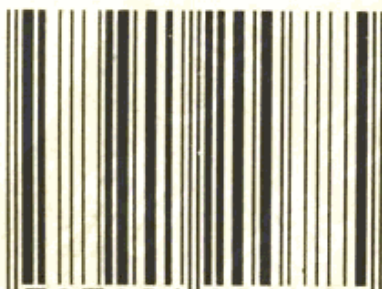
“中华魂”华夏名人传记系列·科学家丛书

(本套丛书 14 册)

杜升云 主编

张 衡 葛 洪 祖冲之 一 行 孙思邈  
沈 括 苏 颂 郭守敬 徐光启 宋应星  
徐霞客 李时珍 冯 如 詹天佑

ISBN 7-80120-078-0



ISBN 7-80120-078-0/

9 787801 200785 > 定价(全套 14 册):50.00 元

# “中华魂”华夏名人传记系列

## 总 主 编

施 国 海 童

## 分卷主编

政 治 家 丛 书:	田 清	方 克
思 想 家 丛 书:	樊美筠	海 童
文 学 家 丛 书:	海 童	橡 子
科 学 家 丛 书:	杜升云	
艺 术 家 丛 书:	李建盛	
改 革 家 丛 书:	李春秋	钟显林
爱国、民族英雄丛书:	李春秋	

## “中华魂”华夏名人传记系列总序

施 国 海 童

伟人，不是那种不识人间烟火，一身清白、毫无瑕疵的神仙菩萨；也不是玩弄权计、乱纲乱朝的贼臣逆子；更不是那种将个人意志凌架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拿人民的前途赌个人命运的战争狂客。真正的伟人，是在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热血与智慧，挽狂澜于即倒、救生灵于涂炭、昭真理于天下、抵外侮于国门的铮铮铁汉；是在和平的年代辛勤耕耘，丰富与发展了民族的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经济……促进了民族繁荣与进步的伟岸丈夫！如果说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伟人更是集合了全民族的智慧与力量，在民族迷惘、国家黑暗的年头，昭示了历史前进方向的指路明灯，是最能代表全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智慧、利益的大圣大哲！是他

们构成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渊源流长的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与历史的伟大民族，在她璀璨无双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圣哲贤人。很难设想：假如我们没有一代圣儒孔子、孟子？！没有一代圣明君主汉武帝、唐太宗？！没有秉笔直书历史的巨擘司马迁、司马光？！没有皓首穷经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巨人张衡、祖冲之？！没有杀身成仁、泽福后世的改革大师商鞅、王安石？！没有抵御外侮虽九死亦不悔其志的爱国、民族英雄岳飞、林则徐？！……中华民族会是什么一种样子！正是由于拥有了他们，我们才敢说：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英雄的，我们的历史是完整的、辉煌的。

大浪淘沙，历经风霜而不凋、历经岁月而难泯的仁人志士，是中华民族最生命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中华民族“魂”。他们的精神就像朝夕相伴我们的阳光、雨水、空气、粮食，早已渗入到炎黄子孙的血液，与我们共同分担着民族的兴衰荣辱。

历史是今天的镜子。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今天，当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最辉煌前景之际，如何让年轻一代的中华儿女尤其是广大中小学生免遭腐蚀侵害，健康茁壮地成长，是时代赋予我们最严峻的课题。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岚清等多次谈到了

如何整理、挖掘古代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指示与精神。正是基于此，我们编纂了大型丛书《“中华魂”华夏名人传记系列》，它包括“政治家丛书”、“思想家丛书”、“文学家丛书”、“科学家丛书”、“艺术家丛书”、“改革家丛书”、“爱国、民族英雄丛书”等七个类别，计 125 余本，分别介绍了 125 余名中国古今名人，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一套关于华夏名人的传记丛书巨著。丛书主要以广大中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用通俗、浅显的语言，重点讲述了华夏名人们如何发奋图强、报效祖国的成才故事，以及他们的精神内核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与思想性，是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最后，尤其需要提出感谢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参加撰稿的专家、学者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较高质量地完成了本丛书的全部创作任务，其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为本丛书的出版增添了不少亮色。

1995. 10

# 目 录

引子 .....	( 1 )
一 治学求道, 传奇一生 .....	( 5 )
(一) 生逢乱世, 刻苦求学 .....	( 5 )
(二) 无意仕途, 一心向道 .....	( 9 )
(三) 学识渊博, 著作等身 .....	( 14 )
二 致求炼丹, 成就显赫 .....	( 19 )
(一) 中国古代的炼丹术 .....	( 19 )
(二) 葛洪的炼丹术理论 .....	( 24 )
(三) 葛洪在炼丹史上的贡献 .....	( 26 )
三 勤研医术, 颇有殊绩 .....	( 36 )
(一) 可贵的医学思想 .....	( 37 )
(二) 在传染病学方面的成就 .....	( 39 )
(三) 在寄生虫病方面的成就 .....	( 43 )
(四) 症状学、治疗学及药理学方面的 成就 .....	( 45 )
四 神道思想, 博大精深 .....	( 51 )
(一) 玄妙的道学思想 .....	( 54 )

(二) 成仙和长生不死思想 .....	(59)
(三) 道本儒末思想 .....	(66)
(四) 贵今思想 .....	(72)
(五) 知人善任思想 .....	(80)
五 葛洪在其他方面的成就 .....	(87)

## 引 子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过这样一个故事：古代长安有位文人叫贾子龙，一日出游，遇见一位风度潇洒，气宇轩昂的客人。一打听，此人叫真生，贾子龙对真生十分仰慕，后来二人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真生酒量很大，又很善于开高雅的玩笑，两人感情很好。

但是，贾子龙生活并不富裕。有一次，贾子龙又请真生喝酒。喝了一会儿，酒就没有了。两人都还没有尽兴。这时真生从兜里拿出个玉制的大酒杯来，然后在大酒杯里倒入一点酒，很快，大酒杯中酒就涨满了，再用小杯把大酒杯中的酒一杯又一杯地舀进酒壶里，一大酒壶舀满了，玉酒杯中的酒还不见少。贾子龙被这一景象惊呆了，他就要求真生把这个技术传授给他。真生说：“你这个人没有别的缺点，就是有些贪心。”贾子龙笑笑说：“不是我贪心，是因为我太穷了。”说完之后，两个人又欢畅地饮起酒来。

但是，贾子龙确实很穷，有时竟处于十分困窘的地

步，囊中无钱，愁于沽酒。可是，每当贾子龙金钱接济不上的时候，真生就从腰中摸出一块小黑石头来，口中念咒，在小瓦片上一磨，小瓦片就会立即变成黄金，然后就把小瓦片变成的黄金赠给贾子龙，用以打酒买菜。但是，真生赠贾子龙的黄金，仅仅够用，没有盈余。贾子龙经常求真生给他多磨出点黄金来，但真生总是不肯，说：“我说你贪心吧，你看怎么样，又贪心了！”贾子龙想：找他明要必然不行，将来把他的黑石偷到手，再以黑石为质，一定请他多给磨点黄金。有一次，俩人又开怀畅饮，真生喝醉酒睡着了，贾子龙偷偷地起来，摸索着在真生的衣兜里去搜寻。但是一下被真生发觉了，他起来对贾子龙说：“你真没良心，以后不可以相处了。”于是真生就走了。

真生走后，贾子龙非常后悔。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有一次贾子龙一人到河边去散步，忽然，他眼睛一亮，看到一块晶莹美丽的小黑石头，非常像真生的那一块。于是，他把小黑石拣回家，并像宝贝一样把它珍藏起来。

过了几天，忽然真生飘然而至，戚戚然若有所失。贾子龙把他请进屋中，问他有什么发愁的事。真生答道：“过去你所看到的那颗小黑石，是仙人的‘哲人石’，这种‘哲人石’可以点石成金，因此也叫‘点金石’。在很早以前，我跟着葛洪大师周游各地时，他可怜我贫穷潦倒，送给我一小块，没想到酒醉后遗失了。但我经过推

算,这块点金石是你拣到了,请你还给我,我一定很好地报答你。”贾子龙笑着说:“我从来也不欺骗朋友,你真算计对了,点金石真是我拣到了。但是,你了解我,我很穷,你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吗?”真生说:“你还给我点金石,我赠给你一百两黄金。”贾子龙说:“一百两黄金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你应教会我口诀,让我亲自点磨。”真生怕贾子龙不讲信用,贾子龙又指天划地发了誓,保证不失信于朋友。真生只好把口诀教给他。贾子龙学会口诀之后,拿着点金石,念着口诀,就想对着院内一块大的卧牛石磨,真生马上拉着他的胳膊说:“发这样大的横财会折损你的寿命,我也会受到上天的谴责,千万使不得。”贾子龙没办法,就从地上拣起半块砖头,放在卧牛石上,对真生说:“只把这块砖点成金,不算多吧。”真生答应了。但是,贾子龙念动口诀之后,不是去磨砖,而是磨卧牛石,真生气得脸都变了色,要上前去阻止,但已经来不及了,卧牛石已经一下子变成了黄金……

这个故事的内容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知道绝对不会有点石成金的什么“哲人石”。现代科学可以把一些金属通过核反应变成黄金,但这样得到的黄金的成本比现在的黄金价格不知要高多少倍,没有人这样生产黄金。但是,在这个故事中提到的葛洪却真有其人,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炼丹家和道教理论家。另外,故事中提到的点石

成金的“哲人石”，也确实是古代炼丹家和炼金家长期追求的目标。西方的炼金家们，也梦想着炼出“哲人石”，从而使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

## 一 治学求道,传奇一生

### (一) 生逢乱世,刻苦求学

晋朝统一中国后的第四年(公元 284 年),葛洪诞生在丹阳郡句容县(现在的江苏省句容县)的一个江南望族家庭。葛洪的祖辈都是朝廷里的大官,他们家族在当地很有影响。葛洪的先祖葛浦庐曾在西汉末年起兵响应刘秀,帮助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葛浦庐因为军功卓著被光武帝封为骠骑大将军。葛浦庐的弟弟葛文跟随哥哥南征北战,他作战勇敢,立下不少战功,但他在多次恶战中周身带伤,并且右眼失明。葛浦庐上书皇上,要求为葛文加封,但是因为葛文是私自从军,没有得到封赏。葛浦庐便把自己的爵位、俸禄都让给了葛文,自己举家南迁到句容定居,过起退隐归田的生活。葛浦庐的所作所为一时被传为佳话。葛洪的祖父葛系

在三国时代历任吴国的吏部尚书、辅吴将军等职,并被封为寿县侯。葛洪的父亲葛悌也出任过吴国的中书郎、中护军、五郡赴警等要职,在吴国被灭亡后被晋朝任命为邵陵郡(今湖南宝庆县)太守。

葛洪童年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终日只是骑马、射箭,习武玩耍。然而好景不长,其父葛悌受晋朝的南迁势力排挤,郁郁不得志,死于邵陵太守任上。由于他一向为官清廉,毫无积蓄,一下子就使身后的孤儿寡母陷于困厄之中。父亲去世时,葛洪时年13岁,他与母亲扶柩还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樵生活。葛洪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困境曾说:“饥寒困瘁,躬执耕耜,承星履草,密勿疇袭。”

由一个士族子弟跌入平民百姓之列,这种厄运自古以来往往倒成了人才成长的催化剂。葛洪在忍饥受寒之中,起早贪晚,耕田打柴奉养老母。艰苦的生活使葛洪很快成熟起来。他开始思索自己的前途,不甘心就这样老于田亩之中。他逐渐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葛洪的祖父、父亲都是饱学名士,家中祖上有丰富的藏书,但到葛洪时早已丧失殆尽。他在农樵之间常背着书箱,走很远的路去向人家求借。借书也往往不能如愿,不是遭人拒绝或受人白眼,就是借来的书经常残破不全。对此,葛洪毫不灰心,锲而不舍于读书之道。为了抄书,他白天砍柴卖钱,以换取纸墨,夜间抄写别人的书本。由于纸张来之不易,因而他抄的书字迹很密,正

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只有他一个人能认识。就这样困难条件下,葛洪 16 岁时才开始读《孝经》、《论语》、《易经》、《诗经》等书。由于家贫又需要奉养老母,使他不能外出求学,也无法找人切磋学问,只能自己钻研领悟。通过几年如饥似渴的学习,他从正经、诸史、百家之言直到各类短杂文章,倒也读了不下万卷,从而为他日后朝着博学多才的方向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葛洪长大成人,生活的磨炼使他很快地成熟起来。这时他博学的名气已传遍乡里,对前途他自然也有一番憧憬。他想到祖辈们都曾在仕途上挣扎出身,大都官居要职,自己又何尝不想有朝一日也大展鸿图呢!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快就使他打消了进入仕途的念头。

西晋统治者昏庸的本质在晋武帝上台伊始便一一暴露出来。不久又爆发了统治者内部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导致十六国纷争,前后近三百年的漫长动乱,堪称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统治者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军阀之间相互攻伐,兵火连天;再加上天灾频仍,使得中原千里荒芜,白骨蔽野。葛洪成年时,正当晋惠帝统治下,这个昏君在臣下报告天下荒馑、百姓饿死时,竟奇怪地问:“为什么不吃肉糜?”皇帝昏庸糊涂至此,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了。面对这样的现实和昏君,葛洪报国的梦想很快幻灭了。

报国无门,回天乏力,葛洪逐渐产生了精研学术,

做些实事,以拯民于水火的念头。他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认定这是一种实用的济世之术,因而广泛涉猎医学典籍,搜求古方,探讨名家学说,使自己的医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葛洪刚成年,母亲便去世了。他安葬老母后,盘算自己如今孑然一身,无所牵挂,决定外出求学。葛洪的堂祖父葛玄,是三国时吴国著名的神仙家术士,传说曾得仙人指点,号称葛仙公,他把炼丹的秘密方法传给了弟子郑隐。郑隐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深通道家修炼之术,80余岁犹身轻体健,满头乌发,能饮酒二斗不醉,数日不食也不会感到饿。葛洪拜郑隐为师,学习诸子百家典籍。郑隐有弟子50余人,独对葛洪最为青睐,不仅把平生所学都传授给他,还让他博览道家秘藏200余卷。这使葛洪对道家的修炼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葛洪又师从南海太守鲍玄。鲍玄也是当时的一位大学问家,且深通医学及道家金丹内炼之术。鲍玄崇尚图谶之学,喜对未来进行占卜预测。他见葛洪相貌清奇,深为器重,不仅对葛洪悉心指教,而且将女儿嫁与葛洪为妻。葛洪在鲍玄处获得很多真才实学,医学上也大有长进。人们都把他看作是鲍玄学术的继承人。葛洪的妻子鲍姑也尽得父传,与葛洪互相倾慕,共同切磋学术。夫妇俩琴瑟和谐,颇为恩爱。

幸遇名师,尽得真传,使年轻的葛洪踌躇满志。他暗自发誓,决心“立一家之言”,在学术上承前启后,有

所创新。

## （二） 无意仕途，一心向道

葛洪学成，携妻回到故里。虽说他无心介入动乱的政局，但由于他饱学之名益著，因而举荐、封官之扰时至。晋惠帝太安二年，扬州的石冰、张昌等人聚众起义，反叛晋朝，一时江淮之间，兵燹突起。吴兴郡太守顾秘被朝廷任命为大都督，前往镇压。顾秘在奉旨召集军兵时，因慕葛洪之名，传令任葛洪为都尉，率兵讨贼。葛洪志向已定，当然不愿从命。但一则军令难违，二则唯恐石冰来骚扰乡里，于是只得招募了数百名乡亲从军。在战斗中，葛洪的军事才华崭露头角。一次，在与石冰军遭遇中，官军大败敌人。敌军迅即溃逃，丢失的金银帛锦堆得像小山似的。官军一些将领都纵兵夺取财物，肩扛车拉，一片混乱。独葛洪怀疑是敌军的诱敌之计。他约束各部，不得擅离行阵，有敢取敌军财物者立斩。因此，行军途中，只有葛洪部下队形严整。果然行不多远，敌军伏兵杀出。其他各部，为顾护财物，无心恋战，一时溃不成军，死伤很重。而葛洪部由于处于临战状态，得以杀退敌军，使官军免遭惨败。由此，诸将都敬服葛洪之用兵，此后葛洪率军大小数战，屡战屡胜，并斩了石冰的儿子。葛洪作战，不仅足智多谋，而且他年幼时所

精练的骑射也使他身手矫捷,勇不可挡。一次战斗中,葛洪冲杀过于深入,只身被敌骑兵围追,情势危急。葛洪挽强弓劲射,敌二人一马应弦而倒,方得惊退追兵,突围而去。

石冰之反平定后,葛洪军功赫赫,顾秘奏请朝廷,封葛洪为伏波将军,赏赐了很多财物。其他将领得到赏赐,大都押送回家或封藏起来。只有葛洪将赏赐的一部分分赐部下众将士,另一部分送给故交好友中的贫穷者。最后留下十匹帛锦,去集市上换回鱼肉、美酒,与将士们痛饮一醉。葛洪仗义疏财之举,被传为美谈。

平定石冰之乱以后,葛洪解甲还乡。顾秘再三挽留不住,方知他确实无意仕途。以葛洪的学识和军事才华,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谋取仕途,定然会官运亨通。但葛洪冷静地认识到,即使自己本领再高,在军阀们的战争游戏中,遭殃的是老百姓,况且许多“乱贼”正是被朝廷逼反的,因此毅然激流勇退。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对现实的彻底失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决不改变早已确定的要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决心。

这时,葛洪专心读书、研究学问的条件虽然已比过去好多了,但生活仍很清贫。他终日闭门读书,几乎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他的院子像无人居住一样,庭院长满了草,篱墙也都破损不堪。他自己更是衣着不修边幅,衣服破了,鞋帽脏了,也照样穿着,而不更换,衣服式样也与流俗不同,忽而大领子大腰带;忽而紧身窄

袖；忽而长袍拖地；忽而短到盖不住脚面。他对当时流行的斗鸡、跑马、弈棋、摔跤等玩乐，一概不感兴趣，偶尔被人强拉去观看，也是在一旁打瞌睡。葛洪给人的印象是不善交谈，行为怪僻，且话语率直，不会迎合他人，因此一般人都慢慢疏远了他。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葛洪正是以这些大智若愚的举动，使得自己能超然事外，赢得安心读书的自由。

葛洪傲物轻俗，与趋炎附势的士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官宦鱼肉百姓深恶痛绝，自诫“车马之迹，不经贵势之城；片字之书，不交在位之家”。这样一来，必然要引起一些士人与达官贵人们的忌恨，对他常加诋毁，而葛洪对此漠然处之。乡亲百姓们对他的举动也不理解，把他看作怪人。但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善良的怪人。因为在附近的穷人没有粮吃了时，只要他家中还有几日的存粮，他都必定要分一半来接济他们，乡亲们有病痛，他都细心诊治，有时药资还分文不取。很多穷苦百姓都受过他的恩惠，所以乡亲们都称他为“抱朴之士”，意思是抱定朴实自守其志的人。葛洪很喜欢这个称呼，而且《老子》中也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之句，于是欣然自号“抱朴子”，以明安贫乐道，“立一家之言”的心意。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葛洪启程前往洛阳。洛阳乃当时西晋的都城，是北方人文荟萃之地。葛洪来到洛阳寻访同道，搜求异书，以增长学识。可是到洛阳后

不久,就碰上了皇族内讧所引起的“八王之乱”,归途阻隔。葛洪颠沛流离于徐、豫、荆、襄、江、广诸州之间,饱受战乱之苦。他的一位故交稽含当时任广州制史,挽留他在幕府中任参军,葛洪虽无意为官,但因能暂时安身,也就接受了下来。后稽含在征战中被杀,葛洪眼看社会现实如此不可收拾,遂萌生归隐山林,炼丹养生的念头。不久,他便辗转返回故里,隐居不仕,精研医学及内炼之功,专心著述。

公元 319 年后,晋元帝即位,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晋元帝来到江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急于拉拢江南士族。因葛洪平定石冰之乱有功,于是加封葛洪为关内侯,食丹阳郡之禄二百户(这只是一个不用上朝理政的虚衔)。公元 326 年晋成帝时,朝中专权人物王导推举他补缺任一州的主簿,转为司徒王导的属官,迁升为谏议参军。葛洪一时难以推辞,只得勉强应承,但他内心实在无意于僚佐之务,因此不久就辞官还乡了。干宝与葛洪亲密友好,举荐葛洪,称他的才能可以胜任修订国史,推荐他为散骑常侍,领衔撰写大著作,但葛洪坚决推辞此任。为了摆脱这些纠缠,他给皇帝上书,说自己年纪渐老,不堪再当重任,只想去炼丹,以求养生延年,因听说交趾(系现在的越南)有丰富的炼丹原料丹砂,就请求皇帝允许他出任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东北)县令。皇帝考虑到葛洪曾立大功,资历高深,屈就小小的边远县令,恐人议论,因而不准。葛洪

再次上书表明自己要当县令不是为求富贵,只是因该地盛产丹砂可供炼丹,因此皇帝才准许了他的请求。于是葛洪携妻室与子侄动身南行,这时他已经 50 余岁了。事实上葛洪并未去成广西勾漏县,因为当他带领全家到了广州后,此时任广州刺史的葛洪的故交邓岳,非常敬重葛洪的人品学识,当他听说葛洪一行要去勾漏,便极言那里是边荒瘴疠之地,竭力劝止,苦苦挽留他们不要前行。葛洪颇感邓岳情深意切,又闻知广东罗浮山也产丹砂,便与鲍姑在罗浮山隐居炼丹。后来邓岳上表要为葛洪求东官太守之职,葛洪仍坚辞不出。邓岳没有办法,只好留葛洪的侄子葛望作他的记事参军,自己也常去罗浮山中看望葛洪夫妇,一起探讨学问,畅游山林。

葛洪在罗浮山中隐居多年,生活由邓岳接济,故得以专心著述,同时与鲍姑实践炼丹养生之术。罗浮山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药材生长也很丰富。夫妇俩优游林泉,飘然世外,炼丹,采药,远离了动乱与喧嚣的尘世。这样一个治学求道的归宿,是葛洪多年梦寐以求的。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创造思维如泉喷涌,可谓他一生学术成就的高峰期。葛洪晚年鹤发童颜,举止宛若仙人,他又常为山民医病,手到病除,老百姓都称他为“葛仙翁”。忽然有一天,他派人给邓岳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我要远行去寻找师父,到时候就出发”。邓岳接到信后心中感到很奇怪,急忙赶往罗浮山中。而葛洪已从早打

坐至中午，像睡着了一般地死去。只见他颜面如生，身体也不僵硬，抬尸入棺时，轻得似乎只有衣服的重量。所以当时迷信的老百姓都传说他是“尸解”（意为灵魂脱体）得道升天了。

一千多年以来，民间有关葛洪的传说很多。因为葛洪在道教理论和炼丹上的成就，道教中人对十分尊重。许多著名的山上都有纪念他的建筑物或是传说中他的炼丹遗址。除了他的家乡句容县及广东的罗浮山等处外，最有名的是杭州西湖上的葛岭，那里有刻着葛洪像的石碑和传说他在那里炼过丹的水井，那里的抱朴庐相传是葛洪著书修炼之处。这些古迹的传诵可能已经历时很久，因为元朝诗人杨载的诗里已经有“一宿葛洪丹井上”和“寂寂丹台夜”的诗句。在福建的霞浦县据说也发现了葛洪的炼丹遗址。其中难免有一些附会之说，但这也证明了历代人民对于这位曾在炼丹术和医药学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炼丹家和医学家的深切怀念。

在近年出版的许多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医学家的书中都有关于葛洪的叙述。

### （三） 学识渊博，著作等身

葛洪是我国科技史上一位伟大的学者，学识渊博，

著称当时。他精通儒学，又是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对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术等都有精深的造诣。像这样在几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在我国科技史上确实是不多见的。

葛洪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一批门类丰富，数量可观的著作。《晋书》的《葛洪传》中说他是“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就是说，葛洪的学问很广博，在江南是无人可比的；他的著作比班固和司马迁的著作还多。《晋书》中列举了他的这些著作名称：《抱朴子》内外 116 篇，碑、谏、诗、赋上百卷，移檄章表 30 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导等各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方使、杂事 310 卷，《金匮药方》100 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在葛洪的自叙中，他说：“洪年 20 余，乃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安武中乃定。凡著《内篇》20 卷，《外篇》50 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笔记 30 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10 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10 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使、短杂奇要 310 卷，别有目录。”可见葛洪 20 多岁起，便立志著述，创立自己的学说。至 40 岁左右的 20 余年间，笔耕益勤，即使在颠沛流离的动乱中也不间断，终于创作和编纂出内容广泛，数量众多的典籍。葛洪的上述自叙出自《抱

朴子·外篇》，那时他还未满40岁。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写了这么多的书，著作220卷，抄述310卷，可谓是精力过人了。在葛洪的后半生中，特别是在罗浮山隐居的20余年创作高峰期中，其著作自当更加丰富，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涵芬楼影印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入了所谓“葛洪的著作”13种。这13种书名，按照它们在《道藏》里的册数的先后次序，列出于下：

《元始上真众仙记》	第73册
《枕中记》	第572册
《抱朴子养生论》	第572册
《稚川真人校证术》	第588册
《还丹肘后诀》	第592册
《抱朴子神仙金钤经》	第593册
《太清玉碑子》	第597册
《大丹问答》	第598册
《金木万灵论》	第598册
《抱朴子内篇》	第868—870册
《抱朴子别旨》	第870册
《抱朴子外篇》	第871—873册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第1013—1015册

这13种所谓“葛洪的著作”之中，《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是可信的原来的著作；《葛仙翁肘后备急方》是根据葛洪的原著，经过南北朝时的陶弘景（456—

536年)以及后人增补的。此外的十种书大概是后人假托了葛洪的名字编写的。有些书如《大丹问答》之类,显然是抄录了《抱朴子内篇》的一部分掺杂些别的话编出来的。在《道藏》之外,至今还存在着的,认为是葛洪的著作的还有两种:收在“汉魏丛书”里的《神仙传》十卷和影印明刻本的《西京杂记》。《神仙传》在《晋书》和《抱朴子》自叙中都曾经提到,应当是真的葛洪著作,不知何以没有收进《道藏》中。《西京杂记》一卷曾经载在《旧唐书》的《经籍志》里,说是葛洪所撰。而宋朝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曾经引了黄长容的《东观余论》里的话,说这部书中的事,“皆刘歆所记;葛稚川采之”。《西京杂记》恐怕也不一定是葛洪编辑的书,因为《晋书》中没有提到。

至于现在已不存在,而在别的书里曾经提到过的,所谓葛洪著作的书名,还有好些。例如南北朝时阮孝绪(479—536年)撰的《七录》里,曾记载《龟诀》和《周易杂占》等书,说是葛洪所著。现在这些书已亡佚,更无法考证其真伪了。

葛洪所处的时代距今已有1300余年了。岁月的推移,使葛洪的大多数著作都亡佚了。所幸的是葛洪的一些重要著作仍能流传至今。至今有书存在而且可以确定为葛洪著作的至少有四种:《神仙传》、《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和《肘后备急方》。

《神仙传》记载了92位所谓“神仙”的事迹,有些确

实有其人,如墨子、魏伯阳等,有的只是传说中的人,如广成子之类。每一人的传文的记载都十分简略,内容又都荒诞无稽,例如说墨子成了地仙,到汉武帝的时候,墨子还“常如五十许人”。这些书既少历史价值,于炼丹术也少参考意义,所以在这里不多加讨论了。

《肘后备急方》是一部医学书。我国古代的炼丹术士一般都兼搞医疗工作,葛洪也替人治病,所以写了些医书。这部《肘后备急方》是葛洪在医学方面的代表作。对葛洪的这部《肘后备急方》和葛洪在医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将在后面详细叙述。

《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是葛洪最主要的著作,是他在炼丹术上的成就和他的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两部书在内容上相差很大。关于《内篇》的性质,葛洪在自叙中曾经说明:“《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之事,属道家。”至于《外篇》则是“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讲的是儒家应世的道理,纯粹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理论,与炼丹术没有什么关系。

据孙星衍(1753—1818年)的“新校正抱朴子内篇序”说,明朝有个姓卢的人把这两部书合刻成一部书,总名之为《抱朴子》。这样把两部不同内容的书合为一本是不可取的。

## 二 致求炼丹,成就显赫

### (一) 中国古代的炼丹术

在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希腊、印度、阿拉伯和西欧各国都兴起过金丹术活动。其目的,一方面是希图制取出能使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按中国古代炼丹术士的说法,人服了这种丹药就可以“神仙度世,与天地相毕,与日月同光”。而且可以“坐见万里,役使鬼神,举家升虚,无翼而飞,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另一方面是试图把一些廉价的金属借助仙药的点化,转变为贵重的黄金、白银。这两方面在炼丹家看来是互相联系的,神丹既可以令人长生,又往往可以变化金银;而用仙药点化成的金银又可服食后使人长生。

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物质生活有富裕,以及出现商品经济以后,人们

追求“长生不死”和“发财致富”的愿望就会很自然地逐步萌生出来。及至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帝王、贵族的生活发展到骄奢淫逸,梦想长生不死和永世霸业的欲望更加膨胀。炼丹术的活动正好符合了他们的这种追求,得到他们的鼓励、资助,于是迅速兴盛起来。

那些虔诚的从事炼丹术活动的人,通过他们当时可能进行的各种化学试验,试图藉烧铅炼汞、变化五金八石,制取那些神丹大药。他们终年累月潜身在被毒气、烟尘笼罩着的简陋实验室中。应该说他们是第一批专心致志窥探化学奥秘的人,所以炼丹术就成为化学的原始形式。虽然炼丹术士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为后来化学的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包括那些失败的记录),也制备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化学药剂和合金,甚至意识到了一些相应的化学反应规律。后世的人也正是从他们的教训中看到前车之鉴,找到了化学的真正历史使命,所以他们对化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有功绩的。在欧洲,炼丹术发展成了近代化学,而在中国炼丹术却没有能够完成这种飞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炼丹术的流行曾持续了两千年。它虽兴起于秦汉之际,但若追溯其根源则可推至远古时代。在原始社会中,人们还没有制服自然的能力,对接触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和灾害,感到不可理解和难以抗拒,因而产生“万物有灵”的观念,并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发生迷信

和崇拜,认为是有神在主宰;而且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幻想人死后灵魂便脱离肉体到另一个世界中去生活。在商代,人们认为疾病和死亡是一种“祸祟”,而“祸祟”是祖宗、神鬼的惩罚或蛊的作怪。所以治病主要是通过祈祷,希望得到祖宗的护佑和祈求神的宽宥。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医学兴起的同时,人们也产生了长生的愿望,他们把这种希望寄托于仙药,更寄托在神的身上。于是神仙之说大兴,寻药和求仙的活动开始。在战国时期,北方的燕、齐两国,南方的楚国都有关于神仙和不死奇药的传说。尤其在燕、齐,盛传渤海中有方丈、瀛洲、蓬莱三座仙山,那里居住有神仙并有长生不死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入海寻仙求药。这时,巫人便发展为方士,他们正是神仙说和不死药的编造者和鼓吹者。《战国策》和《韩非子》中就记载有“怪迂阿谀苟合之徒”曾向楚顷王、楚襄王献“不死之药”的故事,但没有说明它是否是人工炼制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加迫不及待地追求不死之药。他曾多次派人入海求不死之药,使寻仙求药之风很盛。由于海上寻仙屡遭失败,于是方士们又鼓吹食黄金、饮玉泉、饵云母可以驻天年、会神仙。但这些都是天然矿物,而非人工炼制的丹药。所以这时还不能说是炼丹术的开始。

根据较可靠的记载,中国金丹术开始于西汉初年。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颁布了“伪黄金弃市律”,这条

禁律显然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伪黄金制造者,而这种技艺尽管当时可能还很拙劣,也未必出自方士之手,但必然为方士的炼丹术所借鉴。汉武帝刘彻极为宠信方士,热心于神仙、长生之术。当时齐人报告神仙奇方的有万人以上,但试验后都无效验。据《史记》记载,李少君曾对刘彻说:祠灶就可招致鬼物,鬼物到了就可使丹砂成为黄金,黄金做成饮食器,可以延长寿命,就可见到蓬莱仙者,见了仙者,再到名山祭祀天地,就不死了。究竟李少君是否炼成了“黄金”,《史记》中并没有记载。汉武帝的诸父淮南王刘安,也是著名的搞炼金炼丹的人。他招致了宾客方士数千人,其中就有自称能炼制金银的方士。在他和其宾客撰写的《淮南子》和《淮南万毕术》中提到了汞、铅、丹砂、曾青(铜矿之一)、雄黄等等药物,也略略提到一些变化。此后,宣帝、成帝、哀帝以及王莽、三国时的曹操父子都是笃信神仙方术的人。

东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创立了道教。从此,炼丹术基本上就都是由道士掌握了。道士们合炼神丹大药多选名山幽谷、穷里旷野无人的地方。他们修炼的足迹当时已遍及华、嵩、泰、终南、女几、峨嵋、云台、青城、罗浮、天台、少室等28座名山。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了道教圣地。

现在中国最早的丹经据认为是西汉末东汉初成书的《黄帝九鼎神丹经》,其中记载了九种神丹大药的炼制方法,根据所用的原料,可知它们的主要成分是丹

砂、雄黄和黄丹。据该丹经撰者说,这些丹药可令人长生不死,又能点化黄金。东汉著名炼丹家魏伯阳著的《周易参同契》是现存最早的一本中国炼丹术理论著作,讲了一些炼丹术和物质变化的理论,涉及到了一些炼丹术中的化学现象。

到了魏晋时期,中国炼丹术已经历了 200 多年的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已出现了《太清丹经》、《五灵丹经》、《岷山丹法》、《三皇内文》等 200 余种丹法、道书。其中一些思想为东晋炼丹家葛洪所吸收,总结和发展。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对炼丹术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以及当时炼丹术的成果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是现存最完整、最系统,也是说理最清晰,逻辑最严密的一部炼丹术专著。葛洪关于长生术的见解是主张内修与外养相结合。所以,他提出,要想长生和成仙,必须既要外服金液、还丹等神丹大药,“假外物以自坚固”;又要内炼精气,保精守一,为此还要导引行气,实行胎息和调协阴阳,还精补脑;此外还要饮食有度,兴居有节;并且还要积善立功,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可见他对当时各派丹家的主张乃至儒家的纲常名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并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唐、宋两朝是金丹术最盛时代,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炼丹术传到了西方,对西方的炼金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个时代关于炼丹的内容比较丰富,用药的品种

大为扩展,实验操作更为复杂,理论也趋于系统完整。在唐代出现了孙思邈、孟洗、陈少微、张果、赵耐庵、独孤滔等著名的炼丹家,在宋朝也有吴误、白玉蟾等炼丹家,并且有很多的炼丹术著作流传到现在。

世界上决不会有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仙丹”。实际上,这些炼丹术士炼出来的“仙丹”反把不少人毒死。这在西汉,诗人就有“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咏叹。三国时代,曹丕的《典论》和曹植的《辩道论》都提出了方术不可尽信的警告。从晋到隋,因服丹药而致病或致死者,文献上记载的就有晋朝的贾后、皇甫士安和北魏的道武帝等人。在唐朝,受害者就更多了。唐朝皇帝如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人都因服丹药而被毒死。这些无数的惨痛教训,使人们对炼丹术不能不产生怀疑。炼丹术也只能改变方向,转到制药方面,从求长生转向只求治病,或者转到炼气养神方面,就是所谓“内丹”,因此“外丹”的炼丹术就渐渐消沉下去,到了清朝就可以说已销声匿迹了。

## (二) 葛洪的炼丹术理论

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士主要是追求长生不死之方,在他们看来可以致人“寿与天地相毕”的有两类物质,一种是黄金;一类是以丹砂为核心的许多鲜红色的

“丹”。因此修炼神丹大药的理论与实践几乎都与黄金、丹砂直接或间接相关。正如葛洪所说：“我阅读研究养生的书籍，收集长生的方子，曾经披览涉及的篇卷数以千计了，没有不认为还丹（丹砂）金液特别重要的。既然这样，那么这两件事大概便是仙道的极致了。要说服用还丹金液还成不了仙的话，那么古来就没仙了。”

最初的炼丹家都主张食金饮珠，例如李少君就提出：“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为什么炼丹家认为有使人长生不死的神效呢？这种想法主要来自于黄金的强抗蚀性。黄金是一种很稳定的元素，与很多物质都不发生反应，在自然界中可以单质形式存在。对金的稳定性的认识很早就有了，魏伯阳说：“金入于猛火，色不奇精光；自开辟以来，日月不亏明，金不失其重。”他因此认为人服用了黄金以后，就会像黄金永不腐蚀一样，人也会永远不死。这种观点就是“假外物以自坚固”，用服食黄金等外物以求长生。

葛洪也强调“假外物以自坚固”，所以他在《抱朴子·内篇·金丹卷第四》中说：“五谷尚且能养活人，人们得到它就生存，失去它就死亡，更何况上品的神药，其对人的益处岂不比五谷强过万倍呢？”他还说：“丹这种东西，烧得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掩埋了它，天长地久不会腐朽。服食这两种药物，炼入身体，所以能使人不老不死。这大概是借助外物来坚固自身，就像油脂浇火火不可灭一样。用铜青涂在腿脚上，腿脚

入水不腐，这是借助铜的劲力来保护肌肉；金丹进入身中滋润气血，就不仅仅像铜青可以助益表皮了。”

葛洪还引证《黄帝九鼎神丹经》来说明金丹的妙用。他说：“按《黄帝九鼎神丹经》记载，黄帝服食神丹之后，便因此而登空成仙了。又说，虽然呼吸导引及服用草木药物能够延长寿命，但仍不免于死亡；服食神丹使人寿命没有穷尽，与天地相始终，乘云驾龙，上下太空。”因此，他认为“长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导引与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又说：“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乃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

这种希图把黄金的抗蚀性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去以求长生的天真想法，是形而上学的思想。炼丹术士天真地把金石草木的坚实与柔脆和人身体质的健壮与虚弱、生命的多寿与短促这两种本质根本不同的事物等同起来，把物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人的生理、生命现象混同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站不住脚的理由。

葛洪的炼丹理论是和他的成仙和长生不死的理论紧密相连，这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

### （三） 葛洪在炼丹史上的贡献

葛洪在炼丹史上的贡献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三个方面：一是他首次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二是第一次记载了许多炼丹的方法。《金丹》、《黄白》两篇中有些方法是经过实验的，记录得很详细；三是通过这些炼丹法的叙述，知道一些炼丹的材料是什么，它的化学反应又是如何进行的。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炼丹术史上一部极重要的经典著述，可以说是自西汉迄东晋中国炼丹术早期活动和成就的基本概括和全面总结，起到了炼丹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部书对晋代炼丹术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翔实的记载，而且言语质朴，说理清晰。尤其是其中的《金丹》和《黄白》篇集中反映了汉晋时代中国炼丹术化学的面貌。

《抱朴子·内篇·金丹》主要叙述了各种神丹大药的炼制，它较系统地介绍了《黄帝九鼎神丹经》与《太清神丹经》。这两部书都问世于西汉末或东汉初，因此是了解早期中国炼丹术内容的珍贵史料。

《黄帝九鼎神丹经》共记载了九种神丹：

第一种神丹名叫“丹华”，葛洪记述说：“应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礬（音 yù）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作成‘六一泥’，火烧 36 日成丹，服食七天成仙。另外，用玄膏把这种丹药团成丸，放在猛火上烧，即刻就成黄金。此外，用 240 铢丹药合百斤水银火烧，也成黄金。黄金作成的话，丹药就作

成了；黄金作不成的话，丹药就没作成。重把药封起来用火烧，日数如前，没有不成的。”这种丹药实际上是升炼丹砂( $\text{HgS}$ )一物而成，因经“九转”(即九次操作)而成，所以又叫“九转流珠”。实际上它就是升华硫化汞。

第二种神丹名叫“神符”，又称“神药”，由飞炼水银一物而成。也可以用水银与铅混合升炼，那么这时“水银与铅精俱出，如黄金色”，此丹被称为“还丹”，又名“神符还丹”，成分当为氧化铅( $\text{PbO}$ )与氧化汞( $\text{HgO}$ )的混合物。这是中国炼丹史上“龙虎还丹”的最早记载。

第三种神丹就叫“神丹”，也叫“飞精”，是以雄黄( $\text{As}_4\text{S}_4$ )和雌黄( $\text{As}_2\text{S}_3$ )的混合物升炼而成，显然其成分是升华硫化砷。

第四种神丹名叫“还丹”，是把水银、雄黄、曾青、矾石、硫黄、卤碱(主要成分为  $\text{MgCl}_2$ )、太乙禹余粮(褐铁矿与粘土的混合物)、礬石等多种矿物在丹釜中分层安放，密封后升炼而成。

第五种神丹名叫“饵丹”，是升炼水银、雄黄、禹余粮的混合物而成，其主要成分可能为  $\text{As}_4\text{S}_4$  与  $\text{HgO}$  的混合物。

第六种神丹名叫“炼丹”，“取八石而成之”，即是升炼巴越丹砂、雄黄、雌黄、曾青、矾石、礬石、石胆、慈石的细粉混合物(在丹釜中分层安放)而成。

第七种神丹名叫“柔丹”，也是升华水银的产物，但因丹釜内壁涂了玄黄(主要成分为  $\text{Pb}_3\text{O}_4$ 、 $\text{PbO}$  和

HgO), 所以该丹的成分可能主要为 HgO, 与“神符”不完全相同。

第八种神丹名叫“伏丹”, 是用玄黄涂布丹釜, 升炼水银与曾青粉、慈石粉的混合物而得到的, “其色颇黑紫, 有如五色之彩”。

第九种神丹名叫“寒丹”, 是将水银、雄黄、雌黄、曾青、礬石、慈石分层置于土釜中升炼而成。

在“九鼎丹”的炼制中, 反应器是赤土釜; 燃料是用干马粪或糠皮; 赤土釜内外往往要涂上一层玄黄, 具有迷信色彩; 将丹药(升华物)从丹釜中取出时强调要用鸡毛; 服食丹药前还要“面东向日, 再拜长跪”。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汉晋时期炼丹术的风貌特色。为了能对当时炼丹术的活动的情况有个清晰的说明, 我们摘录其中“丹华”的升炼要诀, 可能会对当时炼丹化学操作有一点了解:

土釜可受八、九升, 大者一斗。内外涂之(六一泥)。乃取胡粉烧之, 令如金色。复取前玄黄各等分, 和以百日华池, 令釜内外各三分, 曝之十日令大干燥, 乃可用以飞丹华矣。用真砂(上等丹砂)一斤, 纳釜中, 以六一泥涂釜口, 际会勿令泄也。谨候视之, 勿令有折, 有折如发, 则药皆飞, 失其精华, 但服其糟滓无益也, 涂讫, 干之十余日乃可用。先以马通, 糠火去釜五寸, 温之九日九夜; 推火附之,

又九日九夜；以火拥釜半腹，又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可止火。一日寒之，药皆飞著上釜，如五彩琅玕，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以羽扫取。若药不伏火者，当复飞之。……欲服药，斋戒沐浴，焚香，平旦东向礼拜，长跪服之，如大黍粟，亦可如小豆。上士服之，七日乃升天得仙。玄女曰：作‘丹华’成，当试以作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者药不成，药未伏火而不可服也。[丹华以]龙膏（桑上露水）丸之如小豆，致猛火上，鼓囊吹之，食顷即成黄金。……又以一铢丹华投汞一斤，若铅一斤，用武火渐令猛吹之，皆成黄金也。

前段叙述，是很详细的实验记录。后面所讲的实际上是丹药的检验方法。

至于《太清神丹经》的内容，葛洪秘而未宣。他说：“如果把丹经传授给不合适的人，自己一定会不吉利。如果遇着深信不疑的人，可以把合成药分给他，不要轻易把药方给他。”但他提到在《太清神丹经》上卷中有“九转神丹”。所用原料有赤盐（含 $\text{Fe}_2\text{O}_3$ 的食盐）、艮雪（即水银霜，化学成分为 $\text{Hg}_2\text{Cl}_2$ ）、玄白[即铅粉，化学成分为 $\text{PbCO}_3$ 、 $\text{Pb}(\text{OH})_3$ ]、飞符（成分不明）、朱儿（即丹砂）等，又说最后所得产物须经“九转”，所以该神丹大约是反复经九次升华的硫化汞，或许还含有氯化汞。葛洪说：“转数少的它的药力不足，所以服食用日多而

得仙迟；转数多的，药力就强，所以服食用日少而得仙快。”这里他指的药力可能与丹药的纯度有关，升华是一种提纯一些物品的方法，升华的次数越多，物品越纯，当然效力就会更高。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在《太清神丹经》下卷记载的“九光丹”，实际上是分别燃炼丹砂、雄黄、白礬石、曾青、慈石五种矿物而得到的五种丹药。

在《金丹》篇中，葛洪另外还具体介绍了《五灵丹经》、《岷山丹法》、《务成子丹法》、《崔文子丹法》、《羡门子丹法》、《立成丹法》、《取伏丹法》、《赤松子丹法》、《石先生丹法》、《康风子丹法》、《刘元丹法》、《乐子长丹法》、《李文丹法》、《尹子丹法》、《太乙召魂丹法》、《采女丹法》、《稷丘子丹法》、《墨子丹法》、《张子和丹法》、《绮里丹法》、《玉柱丹法》、《肘后丹法》等 28 种“仙丹”的炼制秘诀。从葛洪个人当时所搜集到的丹经，就可以窥知当时中国方士已进行了大量的炼丹化学实验，已总结了较完整的一套操作规程，广泛地利用了各种矿物原料，制取了不少化学制剂，观察到了众多的化学变化。

另外从《抱朴子·内篇·黄白》还可以知道，到了东晋时期，中国炼丹术士们希图把铜、锡、汞、铁等贱金属转变为黄金、白银的实验也已进行得非常广泛。葛洪说，其时已有“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所谓“黄”就是黄金，“白”就是白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这些转变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们确实制得了

某些黄色或白色的金属,那么对古代的合金学说应该也算是重大贡献了。

葛洪说:“昔从郑公(即郑隐)受《九丹》及《金银液经》,固复术授《黄白中经》五卷。郑君言,曾与左君(左慈)于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如这话属实,那么他们就确实炼制到黄、白的合金了。他在《黄白》篇中简略地公开了一些他所收集到的黄白术技艺,如《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小儿作黄金法》、《务成子法》等等。例如其中《青林子作黄金法》的要诀是:

先行锻锡,长宽六寸,厚一寸二分。用赤盐拌和灰汁作成泥状,用来涂在锡片上面,要求均匀地摊成一分那么厚薄。按此程序作出,层层累置在赤土釜中,大致用锡十斤,用赤盐四斤。然后把缝隙密封严实,用马粪火轻微地烧上三十天。开釜察看,锡中全呈灰状,里头有像豆子一样的小疙瘩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那就是黄金了。

由于道中戒律极严,规定“此道至重,必以授贤者,苟非其人,虽积金如山,地方万里,亦勿以此道泄之也”。所以葛洪也不会书中把此道完全公诸于众,他只是很简略地提及,因此我们今天就不能拘泥于这些文字,仅以它们为依据去揣度那些“黄金”究竟是什么。

此外，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还对各种石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桂、巨胜、柠木实、松脂、菖蒲等等所谓仙药的特征、产地、采集、性质、加工及服食方法都有相当完整的说明，这些内容对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动植物学和矿物学也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对今人了解道教丹鼎派的活动也极为重要。

古代炼丹术士把炼金丹一事弄得十分神秘。在丹经、丹诀中，有关操作和药物都使用了大量的隐语和隐名。在《黄白》篇中，葛洪曾举例说明其中药物使用隐名的情形：

通观方书里所标示的药物名称，又有一些与普通药物的名称相同而实际并不相同的。例如，河上姤女，不是指妇女；陵阳子明，不是指男子；禹余粮，不是指米；尧浆，不是指水。但世俗人看到方子里用到龙胆、虎掌、鸡头、鸭蹠、马蹄、犬血、鼠尾、牛膝，就全说成是血气动物，却不知道它们尽属草药；看到有用缺盆、覆盆、釜鬲、大戟、鬼箭、天钩，就说它们是铁器、陶器，却不知道它们尽属草药；看到有胡王使者、倚姑新妇、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长卿，就说是人的姓名，却不知道仍是草药。对于这些常见的草药，尚且有人不懂，更何况那些玄奥隐秘的方药，谁还能透彻理解呢？

葛洪的这些介绍,对于后代的人研究古时的丹经很有帮助。

在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中提到的药物有:铜青、丹砂、水银、雄黄、矾石、戎盐、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赤盐、曾青、慈石、雌黄、石硫黄、太乙禹余粮、黄铜、珊瑚、云母、铅丹、丹阳铜、淳苦酒等 22 种,这比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所提到的要多得多。

《抱朴子内篇》中记载的炼丹设备和方法也很多。炼丹设备有壇、丹台,它们用来安放炉、灶一类加热器。炉灶也叫丹炉、药灶,有时相当于反应容器。炼丹术设备还包括许多容器和反应器,如鼎、匱、神室、混沌、合子或盒子、铛、釜、罐、燧、瓶、土瓿、筒、坩埚等。这些器物名称术语有时在意义上是相互重复的。如神室和混沌,常常都指密封的上下釜或上釜上鼎,或带盖的合子密封后形成的中空。有时也用鸡蛋壳和其它鸟卵壳作反应器,方法是在其上轻开一小孔,倾出蛋黄和蛋清,再经涂墨加工,即为神室。《金丹》所载的“康风子丹法”,就是以鹄(天鹅)卵壳作反应器。此外,常用设备还有进行液态反应的“华池”,保温用的“灰池”,冷却装置(水鼎、水管等),沙传热装置,以及捣、筛、滤、错、研磨等药料加工所用器具等。

炼丹方法大致分为两类:火法反应和水法反应。具体的火法反应方法很多。如升华(飞、飞升、飞炼)、烘煨(煨、炮、搏、煨、养火)等,这些方法有时也概称为“伏

火”、“伏炼”。水法反应主要是溶解。葛洪所受《金液丹经》一卷,即是“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等服食和溶解黄金作金液的内容。《内篇》还载有“作丹砂水法”、“治作雄黄水法”、“矾石水”、“五石液”、“曾青水”、“云母水”等名称。此外还有接触研磨反应方法,常用于有水银参与的反应。为了得到密闭的火法反应空间,要用到各种密封方法,炼丹术称之为“固济”。最常用的是“六一泥法”。《内篇》中的配方是用戎盐、卤盐、矾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共七种药料。“六一”为七,据说这就是“六一泥”之名的由来。将这七种药料研细混合成泥,涂于容器接缝处,既可起到密封的作用,有时也参与反应。

葛洪的这些记述对于我们了解魏晋时期炼丹术的发展很有帮助。

### 三 勤研医术,颇有殊绩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也勤奋地钻研医术,可以说他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古代杰出医学家。

由于著作亡佚,葛洪在医学上的研究成果,只能从仅存的医籍中去管窥其全貌。葛洪的医学代表作有《金匱药方》、《玉函煎方》和《肘后备急方》三种。前两种都已失传,但在许多古代医书中和其它一些书中都可以看到这两本书的名字,可见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中都有很广泛的影响。《玉函煎方》有100卷之多,从他的自序中可知,此书是他在“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金匱药方》共100卷,是一部规模较大、内容比较完整的大部著作。这是他在阅读了张仲景、华佗等的医书及百家杂方近千卷的基础上,再加上民间的验方、秘方以及他本人的医疗经验汇编而成的。考虑到此书卷帙浩繁,携带不便,葛洪后来又摘其主要内容写成《肘后救卒方》四卷,编成一部

简便实用的医药书籍。所谓“肘后”，就是说这部书可以挂在胳膊肘上随身携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急诊手册”。葛洪认为：珍贵的药品，穷乡僻壤的老百姓既买不到，也用不起，所以应把一些有效的、常用的药方汇编成一本书，方中所用药品大多是容易寻找和价钱便宜的。的确，他的选方完全从方便群众出发，从简单、便利、灵验、价廉等方面考虑，携带方便，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区抑或是在旅途中，也可随时用来应急。所以，这部书编成后，深受历代医家和群众的欢迎。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对这部书补其阙漏，凑成 101 方，称为《肘后一百方》。公元 12 世纪，杨用道把唐慎微的《证类本草》的附方归拼扩大补充进去，改编为《广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现在流传的版本，即是经杨用道增订的。后经《四库全书》著录，而改称《肘后备急方》。从这个版本基本上还可以分辨出葛洪本人的医学成就。

### （一） 可贵的医学思想

葛洪皈依道教，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醉心于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老。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广泛收集资料，也为了寻觅理想的炼丹场所，曾经在华夏大地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他的脚印。在与民间广泛、深入的接触

中,他深感民间疾病的发生和传染,常常因为缺少医者,而又无简易的治疗方法,患者只好坐以待毙。他深感有必要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在《肘后备急方》序言中,他深有感慨地说:鉴于《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匱绿秩》、《黄素》等这些古代经方大多卷帙浩大,有的竟达千卷,非常混杂烦重,而且很难求得一部这类巨著;加上这些著作中所用大多是珍贵的药品,也非一般贫穷病家所能得到的。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金匱药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写成《肘后备急方》。

葛洪的医学思想具有可贵的群众性。他说此书中所载药物大都是乡野之间沟旁篱下易得之物,不必花钱。即使有需要买的,价钱也非常便宜且容易买到,决不会给病人增加负担。书中所述的治疗技术也力求简便易行,如对古代的针灸技术,他只倡用灸疗法,因为针术非一般患者所能掌握,而灸术则人人可做。施灸部位(穴位),他总是通俗、明确地提出大致的位置,如“两乳间”、“脐下四寸”等,而绝少使用穴位名。这样,一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看了也可理解。若能照着书中的治疗方法去做,则可免除病痛迁延之误。这样,就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凡人览之,可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

书中在简述疾病或症状后,详列方药、针灸等治法,文字通俗,叙述简炼,实用性很强。可以想象,1600

多年前,粗通文字的人民群众,有这样一册藏之肘后,遇到疾病即可随时依言施治的医书,的确是受益匪浅的。这也是《肘后备急方》之所以能流传不衰的原因。

葛洪的这种思想和做法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在历史上和现在都有一些医生不为病人考虑,喜欢用贵重的药品,使一般病人难以置办,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去。像葛洪这样为普通的劳动人民着想,用简单、灵验、兼价、易得的方法解除病人的痛苦的做法很值得现在的一些医生学习。

《肘后备急方》的医学价值,决不单纯在于它的临床实用性,书中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症状、病因、治法等的认识,在医学史上也都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对后世中医急诊的诊疗具有某种开创性,而且在许多方面都远远早于世界其它国家,因此《肘后备急方》的科学价值是无庸置疑的。

## (二) 在传染病学方面的成就

传染病,尤其是急性传染病,古来已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总结了当时在发热性传染病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所推崇和遵循。张仲景的诊疗系统,素以严谨著称。葛洪基于自己的医学思想,认为张仲景及其所遵循的《黄帝内经》那一套不适用于穷乡僻壤,更何况

伤寒学体系已不能完善地驾驭全部发热性传染病的诊治。他指出古代治疗伤寒的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葛根汤、青龙汤、白虎汤等 20 多张方子,都是“大方”,复杂难备,因而另行设计了一些简单易行的效方,以应贫穷山村之需。

自古以来,都把热传染病归入伤寒,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且有“冬伤于寒、春必病瘟”的说法。医界一般也都在这个窠臼里转圈。葛洪敢于跳出这个圈子,提出“泻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这里应注意的一是“泻气”一是“相注”。由于《肘后备急方》重在提供易简方剂,不是论述医理的专著,所以他对“泻气”并未深入论述,但他已经跳出伤寒的藩篱。这在当时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许多医生都循规蹈矩,不敢对古代医书中的东西提出质疑,更不用说另立新论了。像张仲景这样的名医,一般的医生对他的学说只有严格的遵从,根本不敢认为他讲的一些东西不对,而葛洪却敢对权威提出挑战,提出自己新的见解,这是需要勇气的。葛洪的这一学说到了明代,发展成“泻气”说及“杂所”说,在清代由叶天士(1667—1746 年)形成系统的温病学说。温病学说补充了伤寒论的不足,区分了温邪和寒邪的不同,说明了其病变的道理和规律。这一学说的形成可以说有葛洪的一份功劳,葛洪的这一思想也可以说是温病学说的先河和萌芽。至于“相注”,则是指这些“泻气”所致的病症,能互相染易,明显地是指传染病。

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足于“伤寒”的新的思想指导，使他在我国传染病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葛洪对许多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的甚至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这些疾病包括：

(1)天花。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所述的“虏疮”，是世界上对天花的最早记录。天花在古代是一种十分可怕的传染病。它起源于东汉，马援于建武年间出兵攻打湘西苗族，传染了天花死去，士兵被传染的也很多。因这种病是从战虏那里传来，所以叫做“虏疮”。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近年来流行着这样一种病，头面及身上发斑疮，很快就传遍全身，形状如火烫起的泡一样，泡里含有白浆，泡破了立即生出来。如果不很好治疗，严重的大多死亡。治好后，留下疮瘢，呈暗紫色，至少要一年多才消退。”他接着指出：“煮葵菜，用蒜捣烂后服用，即能止”。这个记载，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生雷撒斯的记载要早 500 多年。而天花的预防方法——人痘接种法，是到 16 世纪才发明。英国人琴纳发明牛痘，则已在公元 1796 年了。

(2)结核病。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种叫“尸注”或“鬼注”的传染病，即今肺结核一类的疾病。书中卷一是这样叙述的：其病的症状变动很大，有 36 种，甚至 99 种。这是一种会互相传染的疾病，患者大多发热畏寒，精神恍惚，说不出具体病痛所在，却又无处不感

难受。这种病可以拖得很长,病人一天天消瘦下去,时间长了就会丧命。葛洪告诫说,此病“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觉知此候者,便宜急治之”。类似结核病的记载,在葛洪之前的医家可能早有提及,但均不如葛洪的具体、明确和详尽。葛洪关于肺结核的主要症状,发病过程及传染性的记载,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知道,结核病是由结核菌引起的,包括有肺结核、淋巴结核、脑膜结核、骨关节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症状正如葛洪描写的那样。

(3)恙虫病。这是一种叫“东方立克次体”的微生物所致的急性传染病,此病流行于亚洲东南地区,包括我国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红赤色,大小与豆黍米粟粒一般,用手摸之,其痛如刺。几天后,全身疼痛发烧,关节疼痛,活动不便,以后皮肤的病变结痂,厉害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得病之经过,与恙虫病相同。此病一般认为是日本的桥本伯寿于1810年最早报道,其名叫“都都瓦”。但较葛洪之描述,实际上晚了1000多年。美国医生帕姆1878年才记载这种病,较之葛洪就更晚了。1930年,日本学者发现其病原体乃一种立克次体,寄生于沙虱体内,因沙虱螫人而传染。葛洪当时的认识与今天的科学验证已大体趋于一致。

葛洪在书中还详细而准确地描述了沙虱的生活形

态及该病的发病地带、传染途径、预防预后措施等。书中说：“山水间有沙虱(恙虫)，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天阴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凡在水涧浴毕，应以布揩身数遍，又以帛揩之一度，乃傅粉也。”

(4)流行性钩端螺旋体病，或称出血病。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这种病。他说：那一年又有一种使人浑身发黄的病。起病时只觉四肢沉重，精神不爽，不多久，黄色由双眼遍及全身，并且有全身出血的现象，也可致人于死。

(5)黄胆性传染肝炎。葛洪记载的症状是：发病时周身发黄，胸部胀满，四肢感觉到肿胀，有时出汗也是黄的。

### (三) 在寄生虫病方面的成就

古代由于技术落后，没有现代的仪器设备，对疾病的病原体只能靠肉眼观察，故在当时无法发现微生物。医学昆虫虽小，却能被一些认真的“有心人”所发现，葛洪即是这样的一个有心人。

(1)恙螨。这是一种只有针尖大小的传播疾病的医学昆虫。葛洪在书中提到，可以用针把这种恙虫(当时叫沙虱)挑起，它的形状与疥虫相似，只有放在指甲盖

上对着日光观察,才能看清。疥虫是一种皮肤寄生虫,只有  $0.25 \times 0.3$  毫米大小,葛洪把沙虱与疥虫相比,可见他当时已经知道疥虫,熟悉疥虫的形态。一般医学界认为疥虫是阿拉伯医生阿文佐亚(Avenzoar, 1113—1162)发现的,这比葛洪晚了 800 年以上。至于恙螨,则更是近代才得以见到。公元 1758 年,瑞典分类学家林耐正式确立“螨”为一个属,包括 29 种。而现在发现的约有 100 万种之多。

(2)血吸虫病。这是由一种寄生在人体肝动脉血管系统中的寄生虫引起的疾病。《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中溪毒、射工、蜮等病,描述人在溪水中或溪边受感染,起初可有恶寒发热,皮肤上也有小疱,并可引起疮痢,即发热头痛,四肢烦懒,并有大便下痢的症状,在江南、东间诸县,流行此病。这种下痢及发热、皮疹的病症,与现代描述的血吸虫病(急性期)相似。

近年有人认为《肘后备急方》中的沙虱病应是现代的血吸虫病,而射工这一类的病才是恙虫病。这个问题有待深入探讨,目前尚难下定论。

除了上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对于一般的常见病,《肘后备急方》也作了较详细的记述。其中有: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霍乱、伤寒、疟疾、麻风、肠寄生虫病等;营养不良的脚气病;胃肠道疾病的饮食困难、食物中毒;精神神经病如癫痫、狂燥;外科如脓肿、肿块、虫兽咬伤、疥疮、皮肤病。还有五官科疾病、药物中毒、醉

酒、秃发、误吞异物等。症状的叙述则有中风、咳嗽、黄疸、水肿、腰痛、眩晕等等。

#### （四） 症状学、治疗学及药物学方面的成就

就症状学而言,《肘后备急方》中所记载的各种各类不同疾病和不同病症,都很简炼精当,从上述对天花、结核、黄疸性肝炎等的记载,已可见一斑。在这里再叙述两项葛洪的特殊成就。其一是他对不同类型的脚气病的描述,这在我国医学文献中也是比较早的。他认为脚气病首先是在岭南、广东一带发现和流行的,后传染到江南各地。病开始时不太觉察得出,来得较慢,只感双脚发麻微胀痛。渐渐两小腿出现红肿,或双腿乏力,腹股沟处也可有疼痛,并有时恶寒发热的症状,甚至行走不便,也可侵犯腹部。若不及时治疗,同样可以致人于死。这些症状符合现代所说的维生素乙缺乏症的两种脚气病,即干性和湿性脚气病,湿性主要表现为腿肿发麻;干性者又称心脏型,虽无水肿,但侵入心脏后可突然发病死亡。这些记述是相当典型的。其二是书中所载的“角弓反张”症状。患此症后,全身肌体强直痉挛,尤其背肌收缩导致头颈极度向后弯曲如弓,故称“角弓反张”。这一仔细入微的观察,与现代所说的破伤风类病症相同。葛洪所用的“角弓反张”一词一直被

临床沿用至今。

在治疗学方面,葛洪的贡献更为突出。

首先,在治疗被獠犬(即疯狗)咬伤时,创造性地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所谓狂犬病,是说人被疯狗伤,毒素侵入,发作时可令人发狂如疯狗状。得了这种病,病人极为痛苦,而且无法医治。葛洪想:这种病肯定是疯狗的毒液侵入人体造成的,那么能不能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加以预防呢?经过反复琢磨,他就把疯狗杀死,取出狗脑子外敷在刚刚被疯狗咬伤的伤口上,过了一段时间果然有的没发病,有的虽然发病,但症状也轻多了。这种以同一疯狗的脑髓敷伤处治疗的方法,是否果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待证实,但这种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治疗思想,却是至可宝贵的。近代曾证实,狂犬是由于狂犬病毒所致,人被狂犬咬伤后,病毒从伤口进入体内,并与神经组织有特殊的亲和力,导致狂犬病发作。狂犬的脑髓和唾液中均有大量病毒存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正是从狂犬脑组织中分离和培养狂犬病毒,并制成病毒疫苗,治疗该病的。这种方法,现在称为被动免疫治疗。因此,人们常把葛洪的上述治疗方法称为免疫治疗思想的萌芽。

其次,葛洪提出了许多特效的治疗药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治疗脚气病和疟疾的药物。在脚气病的治疗方面,他提出用大豆、牛乳、蜀椒和松节松叶等来治疗

脚气病。现代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物质里面含有较丰富的维生素乙,用其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关于疟疾的治疗,《肘后备急方》中曾提及的疟疾种类较多,计有老疟、温疟、瘴疟、劳疟、疟兼痢等多种。其治疗方法也是多样的,有常山、鼠妇、豆豉、蒜、皂类、鳖甲等,这些药物在治疗疟疾方面都有一定的疗效,虽然有的有副作用或毒性,但在古代仍起着积极的治疗作用。特别需要一提的还有一种青蒿治疗法,其法是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方法的启示下,对青蒿作了研究,发现青蒿中含有青蒿素,这是一种新型的、优质的特效药,它与以往的奎宁、氯喹等不同,对于恶性疟疾,特别是脑型的恶型疟疾,以及对氯喹等具有抗药性的疟疾,均有理想的疗效,被现代医学界誉为继氯喹之后抗疟史上的一个突破。应该指出的是,青蒿中所含的这种有效成分,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物质,在加热后即失去其抗疟性能。而葛洪在书中摒弃了中药最常用的熬汤的剂型,改用绞取汁的方法,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其认真观察和深入实践的科学精神。

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所提出的剂型有很多,如酒剂、软膏、黑膏药(单铅膏)、蜜蜡丸、醋丸、浓缩丸、饼剂、尿通栓、种子乳剂、防疫药剂、兽用药剂等。

在中医中,现在仍在使用一些丹药。有的丹药在治疗一些病症方面有很奇特的效果。由于葛洪一方面是

一个炼丹家,一方面又是医学家,他在炼丹实践中进一步了解了許多矿物的性质和用途,这就扩大了矿物药的应用范围,推动了制药化学的发展。例如《抱朴子》中所记载的用雄黄治毒蛇咬伤,用密陀僧(氯化铅)防腐,用赤石脂收敛等等,都是有相当疗效的。

《肘后备急方》中还提出不少我国古代独特的治疗技术。下面再略举几例:

捏脊疗法。其方法是令病人伏卧床上,医者用双手的手指拈取患者脊柱旁的皮肤,要深取,使其略有痛感,并从鱼尾(就是尾脊处)往上,一直到项背顶端。这种方法治疗腹痛,尤其是儿童疳积病,效果甚佳,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食道异物疗法。在进食时不慎将鱼骨鲠喉或误将其他异物吞入食道时,葛洪采用的方法是:将一团薤白放入口中咀嚼,使其变柔软。然后以绳系住这团薤,令患者整团吞入,直至鲠骨处。因薤系粗纤维,当即将异物裹入。此时医者手拉绳端,将异物拉出。如果异物较大,如误吞钗,也是用一大团干萎的薤,煮熟后,切食一大团,和钗一起吞入腹中,再排出体外。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

葛洪还大量记录了各种食物、药物中毒的治疗方法。其中有野葛、狼毒、杏仁、水银、羊蹄躅、半夏、附子、莨菪、毒菌、毒肉等等,其所用的解毒剂有甘草、大豆、鸡蛋、荠苳等等。这里有的是服用后起化学作用而解

毒,有的是催吐使毒物立即吐出,都有一定的疗效。

作为“备急”,在书的开头首先记述了急救,其中有卒中(中风)、昏迷、暴死、急腹症等。在抢救突然昏迷病人的措施中,记述了用指甲掐压患者唇上的“人中”穴,或者灸唇下的“承浆”穴的方法,这是行之有效的简易急救法,至今在医疗中及民间仍很常用。此外,还介绍了用半夏研成粉末,吹入患者鼻中;或者将干菖蒲捣碎制成如枣核大的药丸,置于患者舌下以急救昏迷。

在我国东晋以前,针灸技术大多详于针而略于灸,而葛洪却是灸法的倡导者。他的《肘后备急方》中录有针灸医方109条,其中灸方99条,可见其占分量之大。他还对灸法的作用、效果、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等都作了全面论述。他还确定了灸的计量单位——壮,从而奠定了灸疗学的理论基础。

葛洪的灸法用于治疗包括有内科、外科、伤科、妇科、五官及传染性疾病。葛洪的妻子鲍姑,因善用灸法而名噪一时。她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著名女灸师,史称“鲍姑艾”。后人为了纪念她,在广州越秀山下开凿了“鲍姑井”,并修建了一所道观“越冈院”。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不失为一本简易急救疗法手册,各种药物都很容易得到,治疗技术也易于掌握,葛洪的医疗技术被后世誉为“简便验廉”,是最高度的概括。他的这些诊疗思想和方法技术,对中医的发展起着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清发展起来的走方医、铃医等学

派,与葛洪有较密切的关系。

## 四 神道思想,博大精深

葛洪不仅是著名的炼丹家,他还是著名的哲学思想家、道教理论家。他在道教思想史上和科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道教的开创时期,他是官方道教的理论、仪式的奠基人。

在前面已讲过葛洪的生平,葛洪的思想是与他的出身、所处时代和个人遭遇息息相关的。

动荡的社会,没落的家世,使葛洪感到仕途坎坷。灭吴之后,司马氏政权对江南士族始终抱有一种歧视和戒心。在外篇《审举》里,他深有感慨地说:“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王制政令,诚宜齐一”,但是,“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此乃见同于左衽之类,非所以别之也。”西晋司马氏政权对于江南士族的歧视,规定贡士一概不给考试。这种情况,从吴土归附的初年算起,到葛洪说这番话时,已经延续达40年之久。针对这种歧视的政策,葛洪毫不隐讳地指出,把东南的士族排斥在经术考试之外,“见同于左衽之类”。就

是说,把他们视为没有什么文化的蛮夷一般。在科举上无望踏上仕途,那么在军功上呢?葛洪在参与镇压石冰起义军中,立了“战功”,于是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葛洪投戈释甲,“了不论战功”,表明没有被录用。

“立功”无望,而个人的特性,也表明他“才非政事,器乏治民”,于是以“不仕为荣”转向“立言”方面发展。对于国家政事的得失,风俗的良窳,教化的兴替,都一一进行评论。《自叙》篇所谓“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发愤精治五经,立志为文儒,这是他前期奋斗的目标。这时候,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救世的,以振兴儒教为宗旨。他的基本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导。这一阶段的思想集中反映在《抱朴子内篇》一书里。

到了后一阶段整个客观形势变得更坏,对于精神上的刺激和感受更悲更深。葛洪的思想从前阶段拯世救时的思想变为出世绝俗的思想。葛洪说: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入无绮紈之娱,出无游观之欢,甘旨不经乎口,玄黄不过乎目”,“百忧攻其心曲,众难萃其门庭,居世知此,可无恋也。”整个世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足以留恋;并且说明仙道和世事不能并行,所谓仙道“与世事不并兴,若不废人间之务,何得修如此之志乎?”因此,他决心舍儒从“道”——专心致志寻求长生之道,做一个宣扬神仙道教的忠实信徒。

葛洪认为长生之道,不在祭祀鬼神,不在导引和屈

伸,而在于金丹大药。以金丹大药求神仙,这是一种宗教迷信。从迷信长生出发,所从事的炼丹术研究,却使他成为一个有丰富科学经验的学者和划时代的道教人物。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抱朴子内篇》中。

葛洪的思想比较复杂,前期的绝非纯儒,后期的也并非纯道。在他前一阶段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思想里,渗透着道家 and 法家的思想。在下一阶段的神仙道教思想里,却也没有容纳老庄所有的理论。比如在外篇里,葛洪以振兴儒教自命的时候,说:“金以刚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执雌节者,无争雄之祸。”这是有意识地采纳老聃的执雌、守柔、不争的人生哲学。他又说:“否泰有命,通塞听天。”这是刻意袭取庄子说的“知命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死生、存亡、穷达,命也”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有着浓郁的道家味道,可视为他明显地撷取道家老庄思想的例证。

可是,在《抱朴子内篇》里,葛洪对于老庄的学说却采取了贬抑和排斥的态度。因为他们的基本理论与长生之道不合。葛洪说:“道书之出于黄老者,盖少许耳”,“五千文虽出老子,然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接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为大旨,永

无至言。”尤其像庄周，主张“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殒歿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万矣，岂足耽玩哉”？神仙道教的目的求练形全身，求长生不死。庄周坚持齐同死生，还说“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这跟神仙道教的旨趣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道家与道教的分界线在这里昭然若揭。葛洪的道教学者的身份，由此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神仙道教，就其社会意义而言，远不及儒家学说切近现实问题。但炼制金丹本身，就其科学技术的历史价值来说，则远胜儒家修齐治平的迂阔议论。

葛洪的哲学思想和道教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中。葛洪在《外篇》里崇尚儒教，矫正时弊，到《内篇》里则宣扬道本儒末，舍儒从道，这体现了葛洪的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这里着重介绍他的关于道教理论和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观点。

### （一）玄妙的道学思想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个“玄”的范畴，认为它是宇宙的本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从“玄”产生的。

把神仙思想和宿命论揉合起来，构成了葛洪的脱

离社会实际的超现实世界的人生观，而比人生观更高更概括的思想是葛洪的神秘主义的本体论，即“玄”。

这个“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葛洪说：“玄是自然的始祖，是万物的大宗。杳渺啊，它多么深邃，所以称其微茫；绵曼啊，它多么辽远，所以称其奇妙。它的高大冠盖九天，它的广阔笼罩八方。比日月更明亮，比风雷更迅猛。或闪烁如光逝，或飘摇如星流，或荡漾如渊澄，或雾霏如云浮。依万物成其为有，寓潜寂成其为无。沦幽冥而下沉，凌星辰而上游。金石不能与它比刚硬，湛露不能与它同柔软。似方而不方，似圆而不圆。来时不可见，去时不可追。赖有它，乾坤升降；赖有它，云雨行布。孕育元气，陶铸天地，呼吸太始，鼓冶万物，旋转星宿，制作草昧，驾驭灵机，吹动四季，隐括静谧，抒发绚丽，抑浊扬清，编排江河，增之不溢，取之不竭，予之不荣，夺之不衰。”

由此可见，所谓的“玄”，是一个极其深远，极其高旷，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为、无所不能的微妙无比、变幻莫测、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东西。凡宇宙的生成，事物的运动，都是这个“玄”的作用。它是先天地而存在，超乎一切之上，而又产生一切的东西。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可能是物质的实体，只能是精神的实体，类似“绝对观念”的东西。这样的“玄”，客观上并不存在，它只能从内心里虚构出来。所以他又说：“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乃玄

道之要言也。”

这里所说的“玄”，与他在《道意》篇里所说的“道”，完全是一个意思。《道意》篇说：“道能包括乾坤，道最初并没有名称。说到道的虚无性时，则它的影响还是具有某种实在性的；说到道的实在性时，则万物又是具有某种虚无性的。即使是发明算数的隶首，也不能计算出道的多少；即使是明察秋毫的离朱，也不能看清楚道的仿佛；吴人季扎、晋人师旷竭尽听力，也不能从幽冥之中听到道的声音；天上飞禽，地上走兽猛飞猛跑，也不能从宇宙之外找到道的痕迹。要论道的细微，则活跃在秋毫之中仍有余地；要论道的巨大，则弥漫到整个太空仍嫌不足。它是带来乐声的乐声，它是带来音响的音响，它是带来形状的形状，它是带来阴影的阴影。方的东西得到它而安静，圆的东西得到它而运动，下降的东西得到它而坠落，上升的东西得到它而飞举。勉强把它命名为道已属失真，何况还要千般剖析、万般分解，使它的姓号称呼至于无穷无尽，这样一来，离开道的真意，不是也太遥远了吗？”

这种若有若无，虚无飘渺，变幻莫测的“道”和他所说的“玄”一样，也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从“道”产生的。葛洪对“玄”和“道”的解释也是几乎完全相同的。

这个“道”也和“玄”一样，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由内心虚构出来的。所以在《抱朴子·内篇·明本卷第

十》中所说：“夫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云虚，唯意所造。”

“道”和“玄”，又与“一”是相贯通的。这个“一”，更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神秘莫测。他在《地真》篇说：“道由一出，贵在无双，而一各居一处，用来象征天、地、人，因而叫它‘一’。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人得一而生，神得一而灵。金属沉于水中，羽毛浮于水上；山势高耸，水势流动；睁眼看它，不能看见，仔细倾听，并无所闻。然而，当你触摸它时，它是存在着的，当你忽略它时，它便销声匿迹；你顺从它，就得吉祥，你背离它，就得凶殃；拥有它时，你就有无穷无尽的福祚，失去它时，你就性命陨落而气丧神失。先君老子说：‘忽啊恍啊，那里面包含万千景象；恍啊忽啊，那里面拥有万事万物。’所谓‘那里面拥有万事万物’，也就是指的一。”他又说：“一能生阴成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以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

“一”既是如此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因此他说：“人们如能知道一，万事便尽在其中了。知道一的人，没有一样东西不能通晓；不知道一的人，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通晓。”由此而强调“守一”的重要，并把“守一”与宗教迷信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使“一”完全成为神秘主义的思想。他说：“仙经上说，‘你想得到长生，守一心明眼亮。思念一到饥饿的时候，一会给你食粮；思念一到了

干渴的地步，一会给你琼浆。”他又说：“人能守一，一也能守人。所以，纵使是白刃当前，也没有容它施展锋利的地方；纵使是百害临近，那也没有容其逞凶的场所。而人与一相得，便能自立败地而终获成功，居于危境而独得安生。假如生处鬼庙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坟墓之间，虎狼出没之地，蛇虺横行之处，而人们一旦做到了守护真一毫不懈怠，那么各种凶神恶煞都得逃之夭夭。”总之，如果能守一，则可以摆脱各种不利的东西。而一旦人们稍有懈怠，忘记了保真守一，则就有被各种鬼怪伤害的可能。在这里“一”被神化了，他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为他的宗教思想服务了。

他所谓的“一”，又具体表现为“真一”。“真一”是可以守之勿失的具体存在。只要能“守真一”，就能够通神，消灾免祸，益寿延年，“得长生之功”。所以他认为“守真一”与炼丹同等的重要。他说：“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守形却恶，则独有真一。”按照他的说法，金丹大药，是令人长生不死的仙方；真一之道，是令人饿不死、杀不伤，猛兽、毒虫、凶鬼不敢接近为害的神术。

“真一”又和“玄一”相通，功效相同。他认为“守玄一”有利于“守真一”，还可以得到分身术，“天灵地祇”都可以接见；“山川之神”都可供使役。所以和“守真一”一样，也是“要法”。

葛洪以“玄”为宇宙的本体，来源于《老子》。《老子》第一章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六章又说：“谷

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葛洪的思想，即由此发展而来。他的从本体到万物的发展过程，是由一而三的思想，也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大体接近。其中的一些语言也与《老子》中的接近，而且在其文中还直接引用了《老子》的话。从这些可以看出葛洪的“玄”、“道”、“一”这些范畴，是袭用《老子》的哲学范畴。但在葛洪这里，却给这些范畴赋予了神仙道教的内容，这些哲学范畴变成了神仙道教的理论基础，既是神仙道教的神秘主义的本体论，又是修仙炼道的重要准则。

## （二） 成仙和长生不死思想

神仙道教的主要目的是长生不死和成仙，因此，葛洪认为：“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而要叫人求长生不死和成神仙，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长生和成仙有没有这个可能？第二，怎样才能长生和成仙？

魏晋时期求长生之风在士大夫阶层中很盛。但很多人只是相信通过服用药物或养生方术可以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而对不死成仙多持怀疑态度。有人根本否定世界上有神仙，特别是凡人修炼而成的仙人。如向秀就反对嵇康“神仙可信”的说法，认为神仙不存在，因为

谁也没见过。

怀疑、否定仙人存在的无仙论思想，早在求仙思想的萌芽时期就存在。这一对认识矛盾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矛盾斗争的衍生物。无仙论最重要的论据是“仙人无验”，无人见过。汉魏两晋时的人又增加了一条：儒家经典没有记载，圣贤不谈神仙话题。

葛洪宣扬天地之间有神仙，神仙可求。对无仙论的两条依据，他都加以了反驳。他强调人的感官能力和感觉经验有限，不能以此去判断神仙的有无。

他说：“纵有最明亮的眼力，对各种有形的东西也不可能全部见过。纵有最灵敏的听力，对各种有声的音响也不可能全部听过。纵有大章、竖亥一样的快脚，常走的路也比不上不曾走过的那么多。纵有大禹、伯益、齐谐一样的智慧，记下的事也比不上不曾记下的那么广。芸芸万物，什么东西没有？何况列仙人物，是满载于竹帛的了。不死之道，为什么没有呢？”

至于周、孔一类圣人为何不谈神仙，儒家经典为何没有记载，葛洪说是“人所好恶，各各不同”，“诚合其意，虽小必焉；不合其神，虽大不学也。”他还强调“日月有所不照，圣人有所不知”，他枚举儒家经典没有记载的，周、孔圣人没有说到的很多事例来说明不能以圣人的言行作有无仙人的判断依据。

那么仙人存在的根据又是什么呢？葛洪主要认为前人的记载是可信的。如刘向《列仙传》上记载有 70 余

位仙人。“诚无其事，妄造何如乎”？“若谓世无仙人乎，然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

葛洪在《抱朴子》一书的许多篇章中，引证了古今的种种史迹来反复论证神仙的存在和成仙的可能。在《论仙》卷中他说：

存亡终始，确属大体，但其中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端，奇怪万方，物是事非，本均末乖，是不可以一律的，有始的比有终的多得很，但合在一起来看，就不是通理了。说夏季一定生长，但荞麦却在此时枯萎。说冬季一定凋谢，但竹柏却在此时茂绿。说有始一定有终，但天地却是无穷的。说有生一定有死，但龟鹤却是长存的。盛阳应是暑热的，但夏天未必没有清凉日子。极阴应是寒冷的，但严冬未必没有暂时温暖。百川东注，但也有北流之水……

有生命的物体，没有比人更灵的了。重视本性的东西，就该都是均齐不二的。但其间贤愚邪正，美丑长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它们存在的不同，已有天壤之差、冰炭之别了。何必偏要奇怪仙人不像常人一样死亡呢？……至于仙人，用药物养身，用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即使久视不死，然而旧身不改。假如仙道

是存在的,就不要认为它困难。但浅见薄识的人,拘泥世俗常规,同道世上不见仙人,就说天下必无此事。眼睛所曾看到的,该拿什么话语来解释呢?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一辈子戴着老天,却不知天的高;一辈子踩着大地,却不清楚地的深。身体是自己所有的,却不知它的心志之所以如此;寿命是自己所有的,却不知它的长短究竟有多少。况且是关于神仙的远理、道德的幽玄,凭着短浅的耳目,来判断微妙的有无,难道不是很悲哀的吗?……所以虽不曾见过鬼神,不曾见过仙人,但不可说世上就没有仙人了。

葛洪在这里,是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相互割裂,把它们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有始必有终,有生必有死,这是一般的规律,这是“大体”,而长生不死的神仙,是超乎一般之外的个别,是独立于普遍之外的特殊。这是形而上学地看待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一般与个别是对立统一的,不能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绝对地对立起来。超然一般之外的个别,或者离开普遍之外的特殊,是根本不存在的。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有生必有死,这是普遍性,是一般。这种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这种一般却存在于个别之中。任何特殊的个别生命现象,莫不包含在这种普遍的一般的规律之中。葛洪把一般与

个别、普遍与特殊互相割裂开来，把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用以论证其长生不死和成仙的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达到其唯心主义的荒谬结论。

葛洪以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来论证长生不死的神仙的存在，这也是徒劳的。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这是完全正确的，只要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东西。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我们在根本上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这就是说，从有限的事物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规律，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进而可以推广到无限的事物中去。葛洪把有限与无限割裂开来，把二者形而上学地绝对地对立起来，以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为理由，来论证有什么长生不死的神仙的存在，这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荒谬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怎样才能长生和成仙，他认为，这只有依靠内修和外养两个方面，即内保精气和外服上药，简而言之，叫做“服丹守一”。

葛洪在谈到长生和成仙的道理的时候，引《仙经》说：“《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上面已经指出：葛洪是把本体论的“玄一”“真一”的思想，变成了修仙炼道的准则。在《地真》篇里，他曾引证《仙经》说：“子欲长生，守一当明。”又说：“守一存真，乃得通神。”可见，葛洪所说的“守一”，就是一种仙道长生的内修的方法。

葛洪所说的内修，主要是指保精行气。而内保精气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叫做行气，一种叫做房中术。这些里面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应当加以批驳。葛洪所说的外养，即是服药。他认为“长生之道，不在祭祀鬼神也，不在导引与屈伸也，成仙之要，在神丹也”。要想长生不死和成仙就必须服用金丹大药。他说：“金丹这种东西，烧得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掩埋了它，天长地久不会腐朽。服食这两种药物，炼入身体，所以能使人不老不死。”

葛洪以金质不败朽为理由，便认为人服了金丹就可以长生不死和成为神仙，这是违反科学的。葛洪所说的长生和成仙的方法，也是毫无根据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葛洪对内修和外养的步骤，也作了具体的说明。他认为，这个步骤便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他还认为，要想长生和成仙，对于内修与外养的各种方法，必须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不可偏修一事。葛洪对以前的各

种方术，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有总集其成而创立自己的体系的思想。

葛洪还宣扬一种极端神秘主义的因果报应思想，并把道教的长生成仙的幻想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他认为，要想得到长生成仙，只是靠内修外养还不够，还必须积善立功，以忠孝、和顺、仁义为体。他把儒家的一套忠孝仁恕信义和顺的思想和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揉合在一起。这种揉合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为了把民间道教改变成为官方的御用工具，为了使道教徒遵守封建秩序，不要犯上作乱。

葛洪还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和人的寿命长短，以及能否成仙，都是在人受气结胎的时候便命中注定了的。他认为做神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缘份的，只有少数人才有缘份去做，能不能做神仙，这和富贵贫贱一样都是命中注定的，即是人间的封建贵族也和天上的神仙一样，都是天生的福气，是不可强求的。这是把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与神仙道教思想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使劳动人民“听天由命”，服从封建统治者的任意剥削与压迫，不进行反抗。这说明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完全是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为封建贵族服务。

### （三）道本儒末思想

前面已述及，葛洪前期的思想是崇尚儒教，以复兴儒教为宗旨。这在《抱朴子·外篇》中体现得很明显。

吴亡之年，世道陵夷，使他早萌“不仕王侯”的志向。但愿“拥经著述”，“立言助教”，“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这里，“兴儒教”，“救微言”，正是他立志要做儒家理论家的旨趣。

“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遂凋坠”，是促成他决心要“兴儒教”的原因。所以他首先要求整饬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王侯公族和贵戚姻亲败坏风教的行为。他说：“今圣明在上，稽古济物”，“想宗室公族及贵门富年，必当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流行的玄风，竞尚老庄，鄙薄周孔。葛洪以复兴儒学自任，当然就要对“老庄之诞谈”以及放诞的行为，给以无情的打击。

儒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维护封建的秩序、纲常和名教。君臣上下尊卑的区分，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决不能动摇的。他说：“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沉，尊卑之威，于是乎著。往圣取两仪，则君臣之道立”。依照儒家传说的说法，天在上，地在下，天是高的，地是卑的，所以君尊臣卑的纲常和名分就确立起来了。君主的尊

严,表现在能够“独断”,专制。君主的发号施令,如同雷庭的响声一般,震慑广大的臣民,臣民们只能俯首贴耳地服从。封建国家元首的尊严与权威,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封建君主有不对的地方,为人臣的虽然可以婉言进谏补过,但决不可以专威擅权,发生什么大臣废立君主的事情。我们知道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本来是魏元帝曹奂朝廷的权臣,后来把曹奂废掉,自立为帝。葛洪这些议论,可以说是针对当朝政变说的。在他看来,废主的檄文,往往以“顺天应人”为口实,实际上只是顺从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小圈里的几个人,毕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他断言:“废立之事,小顺大逆,不可长也”。这就是说,背叛与忤逆的政治行为,是决不可以助长的。这也是对司马氏集团口头上提倡名教,实际上背叛礼教的一种讽刺和鞭挞。

在其后期,葛洪由儒学思想转为道教思想,他的这一转变的突出标志之一是他在《内篇》中强调“道”是根本,“儒”是末节。他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他认为道家之教,是包括了儒墨名法各家之长,而又避免了各家之短。他说:“儒学虽然渊博,但不得要领,令人劳累,成效却甚少;墨家主张节俭,但难以遵循,令人不可能完全照着办事;法家严厉,少恩寡惠,破坏了仁义道德。只有道家的思想能够令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自然法则;能够包容儒家、墨家的长处,总括名

家、法家的要法；能够随着时间的转移而转移，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它的主张简单而易于理解，劳作不多而功效不少；它致力于保全天地造化的质朴，守护纯正精粹的本源”。这一思想，反映了葛洪对儒墨名法兼收并蓄的态度。但他决不是折中杂烩，而是以道家为基点的。

他将儒道对待世事俗务，荣辱升迁，名利福禄的不同态度进行比较。他说：“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的教育，繁多重杂的待人接物的仪式，进升退守的方法，轻身重义的节操，欢乐忧戚的礼乐事务，经世济俗的政治途径，这些都是儒家所尽力营求的。超然物外，抛弃智能，涤除私欲，随机应变，忘却爵禄富贵，拒绝劝勉阻止，不为穷困感到忧虑，不为进升感到荣幸，不为谤毁感到悲伤，不为赞誉感到喜悦，这些都是道家追求的事业。儒家用酒肉祭祀来求福祉，道家靠正道直行驱除邪恶；儒家珍惜的是势利，道家宝贵的是无欲；儒家忙忙碌碌地追名逐利，道家保守纯真而独善其身；儒家讲习的是相互攻伐的史鉴，道家讲习的是遣情娱怀的教戒。道家人物做事的时候，善于自我修炼来求得成功；居住的时候，善于进入山林而与世无争；他们的治理，善于在萌芽状态消灭祸患；他们的施舍，善于普济万物而不求报答；行动起来，善于观察民风，然后决定取舍；安静下来，善于谨慎小心，全然没有烦恼。这些也是道教成为百家统领和仁义始祖的原因所在。”这就是他的道本儒

末，道高于儒的思想。

时人攻讦“为道之士，不营礼教，不顾大伦”，对此，葛洪将周公、孔子与“成仙”的黄帝、老子进行比较。他说：“体察道意来驾驭万物，珍重德理来获得永生，黄帝、老子就是这样的人。既然黄帝能治理社会达到太平盛世，又能够升天成仙，那么就不能认为他比帝尧、帝舜差了。既然老子能够包容礼仪，兼括民风教化，那么就不能认为他比周公、孔子差了。所以，孔子曾慨然陈辞，愿自比老子，对老子不曾有过挑剔和诽谤的言论。然而，末世庸民不知深浅，学习儒墨而非议道家，这与做子孙的责骂父祖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实在是不知道自个儿从何而来，情形也已太严重了！”这里他是祖述黄帝、老子，把“修儒墨而毁道家”的人称为“末世庸民”，骂为“侏儒”，表明他虽主张“包儒墨之善，总名德之要”，但并不改变他的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而是要吸收各家之长，来建立其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

葛洪在谈论儒、道关系的时候，又进一步说明了“圣”和“仙”的关系。他为了破除一般人对周公、孔子等“圣人”的迷信，而对“圣人”作了一翻议论。他认为“圣人”远不如“仙人”，甚至与凡人也没有多大的差别。他说：“世俗所说的圣人，都属治理社会的圣人，不是得道成仙的圣人。要论得道成仙的圣人，那么黄帝、老子便是例证。要论治理社会的圣人，周公、孔子便是例证。黄帝先治理社会，后升天仙化，这是偶尔才出现的，能够

兼有二者的奇才。”他认为圣人有很多,那些独有特长,众所不及的人物,都称作圣。他还指出,一般人把圣人神秘化,作为偶像来崇拜,说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极其错误的。葛洪说:“圣人”与凡人无异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以此来破除一般人对圣人的迷信或偶像崇拜。他所举的一些事实本身并不一定正确,但其企图证明没有什么全知全能的圣人这一思想,还是可取的。但他又怕担当“非毁圣人”的罪名,赶紧特别申明说:“我听说至言悖逆俗耳,真话必违众意;儒士们一旦看到我的这部书,一定要说我是诋毁圣人了。我哪里会是这样的呢?我不过是想穷究事理而已。事理得以穷究,也就好像是在嘲谤周公和孔子了。”为了表明他并不是完全排斥儒教的,他又说:“之所以要重儒,是因为它能移风易俗,不仅指的行礼答谢那一些套套;之所以要尊道,是因为它能无为而治,不仅指的修身养性这一件事情。假如儒道真的有先有后,那么孔子也不可专信,而老子也不可独用了。”即认为二者是“殊途同归”,有相一致的地方,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调和的。因此,他认为二者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兼而修之”。主张以“外儒内道”来调和儒、道的关系,这是他儒道双修,出处两得的两重人格的本质表现,也是官方道教的一个显著特点。由此可见,葛洪的官方道教理论,乃是为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葛洪在儒、道的关系上,虽然认为道本儒末,道高

于儒，并用道家的“玄”、“道”、“一”等哲学范畴来附会他的长生不死的神仙理论。在和儒家相比较时，他一再说：“黄老之德，固无量矣，而莫之克识，谓为妄诞之言，可叹者也。”但他的长生不死的神仙理论，从根本上又是和道家所主张的齐生死之类的学说相对立的，因此，当道家学说和他的这一理论发生矛盾时，就在这部著作中，他也对道家学说进行了攻击。他说：“《道德经》五千言虽然出自老子，但全都是泛泛而谈的梗概罢了，里面全然不愿意有头有尾地通述事理，使人有所凭信，有所依据。仅仅背诵这部经书，却不得要道妙旨，只是徒劳罢了，更何况等而下之的著作呢？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这些人士，他们著书立说，尽管也算祖述黄老之道，效法玄虚无为，但却限于推演大义，并没有确切不易、可供遵循的高论。他们有人还把死亡与生存等同起来，说什么生存和服徭役没有区别，死亡与长休息没有区别。他们背离神仙之道已经太远太远了，哪里还值得反复学习呢？他们的寓言譬喻，有的尚可采纳，用来发挥零星的作用，弥补一时的欠缺。这样一来，结果反倒让后代那些花言巧语的奸才们，那些无德无行的败家子，得以投机钻营，把老庄作为渊源了。这不也是足够叫人痛惜的吗？”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又被道教奉为教主，五斗米教奉“五千文”为“圣经”，但葛洪却说其“五千文”是“泛论较略”，诵此经是徒劳无益。葛洪对老子理论的批评，

是因为老子的理论与他的主张有不少矛盾的地方。他认为“道家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于长生之方也”。他所要建立的是长生不死的神仙理论。他从他的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对老子、庄子等的一些思想、理论提出异议，这是必然的。因为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与先秦的道家学说，虽有一定的思想继承，但二者毕竟是有区别的。

#### （四） 贵今思想

葛洪的贵今思想，不是偶尔一次出现。他有许多言论，是符合历史进化论的。他认为，社会历史是进化的，向前发展的，应当是“今胜昔”，而不是“昔胜今”。因此，他反对贵古贱今的思想。

他说：“世俗之人都重视古代的东西，认为他们特别高超，却褻渎轻视同时代的东西。虽然有追风马，他们仍会说不如造父所驾驭的；虽然有价值连城的珍宝，仍会说它不如楚人卞和为之而泣的那块璞玉；虽有比划一下就能斩断东西的好剑，仍会说它不如欧冶子所铸的；虽然有起死回生的药物，仍会说它不如医和和扁鹊所调制的；虽然有超群的人才，仍会说他不古书上所记载的古代人才；虽然有对社会有益的著作，仍会说它不如前代传下来的文章。因此，孔子不被当时人看

重，最玄妙的事物被一般人讥嘲轻视。浅俗的人总是说：‘现今的山不如古时的山高；现今的海不如古时的海宽；现今的太阳不如古时的热；现今的月亮不如古时的月亮亮。’他们怎么肯允许现今的才士不如古时的枯骨差呢？重视耳朵所听到的，轻视眼睛所看到的，这种现象已经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忧患了。以前像伯牙那样碎琴断弦以谢知音的人，这样做，确实是有缘故的啊。”

这种认为古代一切都好，现在一切都不行的思想，是一种复古主义，是违反历史进化论的，持这种观点的“俗士”，恰似鲁迅所斥责的“九斤老太”。在1600年前葛洪便对这种类似的“九斤老太”提出了批评，这是非常可贵的。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而对鲍敬言的“昔胜今”的无君论进行了批判。

葛洪在《抱朴子》的《诘鲍篇》中引述了鲍敬言的理论。根据本篇所引述的来看，他的基本思想是“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也就是“昔胜今”的思想。他用古今对比的方法来阐述了他的“昔胜今”的思想。一方面，他认为古代一切都尽善尽美，他说：“上古时代，没有君没有臣，凿井饮水，种地吃饭。太阳出来就去劳动，太阳落下就去休息。像水上泛舟一样，无拘无束悠然自得，没有竞争没有谋求，没有荣耀没有耻辱。山里没有路径，湖上没有舟桥，河流和山谷都不通，那就不能互相兼并。士卒不能聚集在一起，那就不能互相攻打。如此不是连高处的鸟巢都去掏，不是排尽潭水把鱼捕尽，那么

鸾凤就会在院中檐下栖息，龙和麒麟就会成群地在园子中和池塘中游动。饥饿的老虎可以踩踏，蛇也可用手去捉。渡过湖而水鸟不会飞离，进入树林狐狸兔子也不会受惊。权势利益的概念没有萌发，祸患混乱就不会发生，用不着武器，也不用设置城墙和护城河。万物混然一体，人们在路上互相忘却。瘟疫不流行，百姓能够长寿而终。内心纯洁坦荡，不萌生诡诈之心。口中吃着食物嬉戏，吃饱肚子到处游逛。人们的言辞并不华美，人们的行为也不矫饰。这还怎么会搜刮抢夺百姓钱财呢？还怎么会施严刑而设置陷阱呢？”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今之一切都坏，他说：“到了来世，使用智谋生出诡诈。道德衰落以后，有了地位高低的次序。地位升降和制度兴革的礼仪日见繁琐，人们用祭服、礼冠和彩帛的衣服装饰起来。建起高入云霄的楼阁，在梁架上绘以彩饰。推倒大山来搜求宝贝，潜入深渊采收珍珠。聚集的玉石像树林一样多，也不够用来穷尽他们的需求变化；积攒的金子像山一样高，不足以供给他们的费用。在荒淫的领域里放纵无忌，完全违背了造物初始的本性，脱离宗旨日益遥远，违背朴厚更加厉害。尊崇贤者，百姓就要争夺名誉；注重钱财，盗窃之风就要兴起。看见了可要的东西就迷乱了原本正直的内心，摆列着权势利益就开辟了争权夺利的道路。制造锋利的武器，就会使侵害人的祸患增加。弓弩怕不强劲，铠甲怕不坚实，枪矛怕不锐利，盾牌怕不厚实。如果根本没有欺凌和残暴，这

这些东西全都可以扔掉。因此庄子说：‘如果原来的白玉不毁掉，用什么做成珪璋呢？如果道德不废弃，从哪里去取得仁义呢？’让那些夏桀商纣之辈能够用火烧人，裂解进谏者，把诸侯做成肉干，把一方的诸侯之长制成肉酱，挖人心，剖开人的小腿。骄横恶毒到了极点，甚至使用炮烙的酷刑。如果这些人都只是与其他人一样的平常人，即使性情再凶狠，又怎么能干这些坏事呢？他们之所以可以放肆暴虐、恣意行事、屠杀宰割天下人，就是由于做了国君，所以能任意胡作非为。君臣的关系建立之后，各种邪恶日渐增长。人们在桎梏下愤激，在艰难中忧愁。国君在朝廷上忧虑恐惧；百姓在困苦中煎熬。在这种情况下，用礼度来防范，用刑罚来整治，这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滔天的水源，激发了一个不知多大的水流，却要用一撮土去填塞，用一只手去挡住一样。”

鲍敬言认为，古代的原始社会，既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没有君臣之分，也就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互相掠夺和兼并，没有战争，没有犯罪，也没有刑法，人们自由平等，彼此和睦相处，大家都靠自己的劳动过着幸福的生活。他认为：君臣之道，阶级之分不是“天意”，而是人为的，是由于强者凌弱，智者诈愚而来的。在有了阶级和君臣之分以后，由于君主贪得无厌，穷奢极欲，于是掠夺、战争、盗贼、刑罚等等也就随之而起了，人们生活极端困苦，又冻又饥，不得不起来反抗，冒犯统治阶级的法律。他认为当时社会所有的一切罪恶都是由

于存在国君的缘故。鲍敬言的理论就是古时的东西比当时的好,即“昔胜今”。

鲍敬言揭露了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种种剥削和压迫,认为人民造反是官逼出来的,并认为在阶级社会以前,曾经有过没有君臣、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原始社会,这些都是正确的。但由此而认为古代的原始社会胜于后来的阶级社会,主张回到原始社会去,这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错误的东西了。

葛洪对以鲍敬言为代表的“昔胜今”思想进行了批判。葛洪认为,阶级社会和原始社会相比,无论就文化的发展水平而言,还是就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言,都要胜过原始社会。在人类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已经提高,社会已经向前发展了的时候,还要想回到穴居野处,茹毛饮血,赤身裸体的野蛮时代去,过那种野蛮人的生活,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鲍敬言那种想回到原始社会的观点,是违反社会进化论的。葛洪对鲍敬言的复古主义的批判,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鲍敬言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也没有任何争夺,都生活很幸福,简直成了理想的神仙境界。葛洪认为,这既不合情理,也不是事实。他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并不是木头石块,也需要衣食,既然需要吃穿,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没有矛盾和斗争,国家和君臣,正是这种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说:

“如果人与人争夺一棵小草般的小利，家与家为鸟巢兽窟之类的地方而争吵，上边没有治理冤枉的官员，下边却有向自己人的同伙，那么私人的毆斗比公家的战争还要厉害，木棍石块比武器更为锋利，尸横遍野，流血染红道路。如果长时间没有国君，人类就会灭绝了。”葛洪这种关于原始社会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以及关于国家起源的看法，尽管还很粗浅，但也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不能对它完全持否定的态度。

由上可见，葛洪对鲍敬言的批判，以及鲍敬言本身的思想，都有其不合理的方面。鲍敬言对于阶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的揭露，是很宝贵的，而在葛洪对鲍敬言的批判中，也包含有很宝贵的思想。对他们的思想，我们都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

葛洪这种历史进化论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文学的看法上。他认为文学也是进化的，向前发展的，只能是“今胜昔”，绝不是“昔胜今”。针对那种认为古代的文学作品都比当时的作品好的观点，他说：“《尚书》，是政事文告的集子，但不如近世的褒奖文告、皇帝诏书、军事文书、表奏疏仪清新丰富华美。《毛诗》，是华丽光彩的作品，但赶不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这些赋作深广博大。”同时，他还以古今写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证明文学上的“今胜昔”。他把那些在文学上抱“贵远贱今”观点的人比作“守株之徒”。他说：“那些守株待兔拘泥守旧的人，局限于所欣赏的作品，

只有耳朵没有眼光,怎么能谈这个问题呢?他们对于古人的作品认为很神秘,现在的作品则认为浅薄,看重古代而轻视现在,是有其来处的。因此新铸的剑因为伪刻古款而身价倍增,破烂的书籍由于假托古人所作而被人珍视。所以古书虽然质朴无华,而庸俗的儒生把它说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的文章虽然华美如玉,但一般人却把它视同瓦砾。”这种认为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凡是“今”的都是不好的,本来是个不好的东西,只要给它贴上一张古的标签,冒充古货,就可以身价百倍,本来是很宝贵的东西,就因为今人的作品,就认为一钱不值,这就是“贵远贱今”的“昔胜今”思想在作祟。这种“贵远贱今”的思想,的确是很顽固的,是由来已久的。葛洪对此进行批判,是非常有意义的。

同时,葛洪还批驳了魏晋以来的一种流行看法,即认为“古代著书的人,才气大,思想深刻,因此他们的文章隐晦,不容易理解。现在人思想浅,才力低,所以文章外露而容易理解。用这种浅显易解和那种深刻难懂相比较,就像是小沟渠和长江大河相比较,蚁穴口的小土堆和嵩山泰山放在一起一样。”葛洪针对这种错误观点,具体分析了古书之所以“隐而难晓”的原因,他指出“古书多数隐晦,不一定是古人故意要让它难懂,有的是因为时代不同语言有变化,有的是因为方言不一样。经历了灾荒战乱,埋藏的时间长了,竹简编成的册籍绳索腐烂断折,丢掉的很多,有的掺杂连接或残缺不全,

有的脱落了章节句子,因此难懂,好像深奥罢了。”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他又指出,写书像说话一样,应当力求通俗易懂,使别人能够了解你的意思。

葛洪还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文学总是“今胜昔”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于“古代事事都厚重朴素,现在无论什么都雕画修饰,时间推移时代改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毛毡锦缎漂亮而且结实,不能说它们比蓑衣要差;有帷幕的輶辂车好看而又结实,不能说不如原始的椎车(一种用整块圆木做车轮的简陋车子)。”这就是说,因为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所以文字方面的后来居上,便是很自然的道理。他还指出:“如船和车代替涉水和步行,文字笔墨改变了结绳记事,各种后来产生的都比以前的要好,它们的功劳业绩相差千万倍,不能再一一列举。世上的人都知道什么都发展得比以前快,为什么只有文章不如古代呢?”

在科学技术的应用方面,当时也存在贵古贱今的思想,葛洪也进行了批判。

葛洪从多方面反复说明今胜于古、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并且几乎上升到一般规律的高度,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思想,应当加以肯定。

## （五） 知人善任思想

在《抱朴子》一书中，葛洪对知人善任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在《官理》、《务正》、《贵贤》、《任能》、《钦士》、《审举》、《备阙》、《擢才》、《名实》、《清鉴》、《行品》、《百里》、《接疏》、《汉过》、《吴实》等篇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知人善任的思想在葛洪这一著作中所占的地位是很突出的。

东汉时候，是豪强地主集团的专政。这些豪强地主凭借他们在政治上的特权，利用家族关系的传统势力，完全垄断了做官的道路，并且横征暴敛，残酷地掠夺民财，使广大人民遭受了无限的灾难。特别是东汉后期，宦官外戚独霸政权，内外重要官职都被他们占据，造成黑暗的统治。而所谓察举制度，在这些豪强地主的操纵和把持下，完全有名无实。他们甚至公开卖官，有钱的人买到官后更加变本加厉压榨百姓，老百姓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生活全绝。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给豪强地主的黑暗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之后，魏晋时代以九品官人制度代替了察举制度。而九品官人制度又为士族地主集团所控制，形成了门阀士族的统治。少数士族又利用其家族关系和政治特权，垄断了仕途。选官用人完全以士人门第的高低来作为是否录用的标准，这叫

做“门选”。任何人(包括皇帝在内)都不能侵犯高级士族或高级官吏的特权,造成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为天下大乱的祸根,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因此,葛洪在阐述知人善任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时,首先便对汉末以来在选官用人问题上的各种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指出了它的严重危害,用这种历史教训来说明选贤任能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

葛洪指出,汉末以来,大权为少数豪强垄断,这种人只晓得结党营私,“废正兴邪”,不能“拔才”,只是选用自己的一些“戚属”和一些“庸琐”、“附己”之徒,而且大肆诛锄“忠贤”,迫害异己,使“忠谏离退,奸凶得志”,以致“凌上替下”,天下大乱,“凶家害国”。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失人”。也就是没有做到知人善任。

《在抱朴子·外篇·汉过卷第三十三》中他说:“历览前代,一直到近代,正道衰微,风气败坏,没有比汉末更厉害的了。掌握权力,占据尚书省的宦官们,操纵帝王,手握国柄,废正义而兴邪恶。相聚话语很多,背地里又恨人家。追随着一群聋子傻子。共同作恶的人成群结队,吸引来一群奸邪的党徒。侵吞财物,大量聚敛。提拔官员,不是钱财多的不能显达;诉讼案件,不是重施贿赂的不能雪冤。官位高,权势重,力量足以选拔人才,但不肯说一毫一厘那么点话来举荐对时代有益的杰出人才。他们所任用的,不超出妻妾亲属的范围;他们所

施予恩泽的，不外乎亲近熟悉的平庸猥琐之徒……贬抑压制独立不苟的人，推荐提拔趋附自己的人，这就是像楚国樊姬那样的人掩口不言，冯唐那样的人永远慨叹的原因啊！为求合于当时，人们都不劳而食，苟且取悦于人，遮掩阻滞有德有才之士。忌妒有功劳的人就去危害他，痛恨清白廉洁的人就排挤他，讳忌忠诚直言的人就去陷害他，厌恶操守坚定的人就摈弃他。柔和谄媚的人受到夸奖和帮助，刚正不阿的人遭到诋毁和遗弃。……于是明智睿哲的人离去隐遁起来，才能杰出的人闭口不言，假装愚蠢。疏远卑微的人展翅飞翔选择树木来停歇，被束缚的人虽身在朝廷而实同退隐。有智谋的人不肯吐露他的秘密的谋略，勇敢的人不肯贡献他的果敢刚毅。忠诚正直的人离开退隐了，奸邪凶恶的人得志了。邪恶横流漫溢而不能遏止，邪路开辟而不能杜绝。以至于尊卑颠倒，世道衰微，强盗到处出现。宦官夺取了君主的威权，三公九卿死在鄙陋者手中。忠诚贤良有声望的士人，被叫做结朋党团伙的人，被捕捉囚禁、杀戮、消灭，以致于危害国家。”葛洪说这一切都是由于“失人”，错用人才。

葛洪又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指出知人善任，选贤用能，乃是国家“升泰之所由”，反之，则“危亡之端渐也”。他认为，奸人专权，在选官用人上，就必然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举荐一些“附己”、“利己”之徒，结成“奸党”。而公正无私的人，则无辜地受到打击和迫害，只好

纷纷自行引退，避而远之，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葛洪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对汉末的卖官鬻爵，残害忠良的丑恶历史，进行了揭露和痛斥，并指出这正是“有汉之所以倾，来代之所宜鉴”的历史教训。葛洪的这种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取的。他指的是汉末，实际上也包括魏晋，他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说给当时东晋的统治者听的。

葛洪还认为，由于汉末以来，“政在奸臣”，不能知人善任，使有才有德的人受到排斥，而一些只会阿谀奉承、有势有财的人得到重用，以致“力竞成俗”，不可收拾，结果造成“网漏防溃，风颓教沮”的局面。他说：“汉代末年，桓帝灵帝的时代，帝王失去了权柄，政权握在奸臣手中。法网开漏，堤防溃决，风气颓废，教化衰败，压抑高尚的品德而扬举谄媚之行，贬退躬行正道的人，提拔财产多的人。以实力相争成为风俗，苟且而得，没有羞耻之心。有的献纳自己购得的宝物，有的出售显要人物的书籍。有的父亲哥哥身居要职，看门第而征召任命。有的低头屈膝，时间长了也被收为官。”葛洪对汉末魏晋的风教作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正是由于选官用人不当，违反了知人善任的原则，以致败坏了学风，造成了很坏的社会风尚。

葛洪根据汉末以来选官用人的历史教训，一再强调知人善任应当是人君的首要任务。他认为一个国家

的君主能不能做到知人善任,这是能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的关键问题。为什么人君要以知人善任为其首要任务呢?他指出,一个君主只要在下面有一批贤才辅佐,就不难把国家治理好,使天下太平。而且,只要有了一批贤才辅佐,即使国君本人很“骄恣”,也不至于败亡。相反,人君如果不能知人善任,用人不当,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败亡。他又以历史事实来说明能否“致贤”、“得士”是关系国家存亡的道理。

那么,应该怎样知人善任呢?知人和善任,二者密不可分。善任应以知人为前提,要能善任,首先就必须知人。而知人是不容易的,因为“事物有的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好像是那样实际不是那样。料定了就没有错误,见到外貌就得知内心,圣者恐怕也会感到为难。更何况一般人呢?因此用人才取士人,荐举亲近的人,结交朋友,都不能够不精心选择,不能够不仔细考察。”为此他列举了十个区分“臧否”、辨别“真伪”的难题。这十个难题,也是识别人才应当注意的十个要点。

在如何知人的问题上,他除了提出必须区分臧否、辨别真伪而外,还提出了一些如何知人的原则。他说的这些原则,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葛洪指出,要知人,要识别贤才,首先自己就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否则,即使有贤才,你也不能识别。

其次,他指出,要识别贤才,还要避免个人的成见,不能以一般的好恶为标准来识别人才。

第三,他指出要识别贤才,还须善于识别谗奸之人对于人才的诽谤和诬陷。

第四,他指出,要识别贤才,就不能以貌取人,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必须看一个人的本质和主流。他还要要求能够发现俊才于无名之中。

关于怎样善任的问题,他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认为每个人都各有其长短,因此,善任人者必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绝不能以其所短弃其所长。

第二,要善任,做到“才无失授之用”,就必须大胆选拔幽隐,起用疏贱“无援之士”,罢黜阿谀曲媚而又失职无能的左右亲信,特别要注意严防这些人的朋党互相吸引,构害和“壅蔽”下面一些确有真才实干的人。

第三,葛洪认为,要使任人得当,则举、任都必须公正无私,不能按照门第,而是必须严格按照德才标准办事。

第四,葛洪认为,任人不当,也往往由于负责选举的官吏破坏选举规定,不是“为官择人”,而是借此机会送人情,培植私人势力,甚至接受贿赂,推荐一些不学无术、无才无德、为非作歹的人,上亏君主之明,下则荼毒百姓。葛洪认为,要任人得当,还必须不讲“私情”,杜绝“后门”,严格照法纪办事,对所举者要经过详细的考察或考试,凡是发现有受贿而所举不当者,则举者与被

举者都必须依法治罪。对已经任职的官吏,凡犯有“贪浊赃污”罪行的,必须“以法律从事”,进行惩办。

葛洪生活的时代,正是门阀士族当权把持朝政的时候,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不得志。因此,他并不代表士族阶层。他的这些主张,尽管归根结底仍然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但代表的是一般中小地主向门阀士族争取做官的权利,所以其中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

## 五 葛洪在其他方面的成就

葛洪除在炼丹术、医药学和道教理论等方面均有很大的成就外,他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中国的道家把追求长生不死作为目的,除了炼丹寻找长生不老药外,他们还特别注重养生,形成了许多关于养生的理论。葛洪在养生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葛洪在综合前代医学家和炼丹家有关养生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众术合修”的养生学说,将中医理论与道家实践结合起来,这在历代养生学说中可谓独树一帜,影响很大。

他认为,凡修炼养生之术者,要多综合有关各种学说和方法加以分析、领会。只有见识广博,才能够正确地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修炼方法。如果只是拘于一种方法,不一定能成功。因此,他将行气、导引、房中、服食、符咒、药饵、外丹等各类方法融汇贯通为一体。这就是各不偏废的众术合修养生学说。他说:“养生之尽理

者,既将服种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宜动荣卫,使无缀阂。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

他还强调养生之道须从小节入手,“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至亿也。若能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这种防微杜渐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量变可以引起质变,养生要从小处做起,这具有辩证的思想。

更为可贵的是,葛洪认识到了心理、情绪对于养生的重要性:“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术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葛洪的这种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即认为养生应养性。但他所指的养性是消极的养性,无喜无怒,无爱无恶,这是一种逃避社会现实的办法,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应提倡积极向上的思想,以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面对人生、面对社会。

此外,葛洪还总结出如坚齿法、聪身法、明目法等养生方法,有的甚直流传至今。

葛洪在天文学上也有所建树,他撰有《浑天论》一书。我国古代对宇宙的看法,据东汉蔡邕所说,可以分为三家,即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葛洪是赞成浑天说的。据《隋书》天文志记载,葛洪在解释浑天仪时说:“天

如鸡子,地如鸡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之百注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当然,浑天说也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但比盖天说前进了一步。盖天说认为天也平平,地也平平,人们仰视穹窿的天,就好像覆盖的样子。太阳则跟着天转,不是入地。太阳西转后,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距离遥远的缘故。葛洪驳斥了这样的理论,他说,距离火炬较远,则火光微弱,但是,太阳、月亮从出来到入没,并非逐渐变小,因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盖天说还认为月亮、太阳都不是圆形的,所以能看见它是圆的,也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葛洪用月亮初生时和朔方时不圆,日蚀是从侧边蚀起,慢慢地蚀尽来驳斥。葛洪的理论是对盖天说的沉重打击。

当然,在今天看来,葛洪的理论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时的条件下,葛洪不可能达到我们今天一般人对天文的认识水平。然而,葛洪的认识比盖天说前进了一步,这也是很难得的。对任何事物的科学认识正是这样一步步从谬误走向真理的。

葛洪还探讨了潮汐的涨落,著有《潮说》一书;他还注意军事兵法,写了《抱朴子军术》等著作。